上編

中編

二、西化問題的討論

下編

四、中國文化建設的動向

五、文化建設與其他

六、中國文化的探討

七、文化的涵義

附錄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編者按：又名「一十宣言」，因爲這個宣言是在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日發表的。最先載在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日出版的文化建設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後來各日報各雜誌均有轉載。

一　沒有了中國

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對面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蜷伏的嚴寒中，沒有光，也沒有熱。爲着尋覓光與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有的雖拚命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有的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脚，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衆生的繩，把他們吊上光明溫暖的天堂；但骷髏是把他們從黑暗的邊緣帶到黑暗的深淵，從蕭瑟的晚秋導入凜烈的寒冬；傳教師是把他們懸在半空中，使他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虛無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結果是同一的失望。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

的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

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日本的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強烈色彩，那裏還成爲日本畫！」我們在文化建設上，也需要有這樣的認識。

要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我們應在這三方面盡其最大的努力。

二　一個總清算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曾佔過很重要的位置。從太古直到秦漢之際，都在上進的過程中。春秋戰國形成了我們的希臘羅馬時代。那真是中國文化大放異彩的隆盛期；但漢代以後，中國文化就停頓了。宋明雖然還有一個新的發展，綜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來的佛學，然而並未超出過去文化的範圍，究竟是因襲的東西。直到鴉片戰爭纔發生了很大的質的變動。巨艦大砲帶來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帶來了威脅中國步入新時代的警告，於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動搖，我們乃從因襲的睡夢中醒覺了。

隨着這種醒覺而發生的，便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康有爲梁啓超的「維新」運動，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

曾李的洋務運動祇知道「堅甲利兵」和「聲光化電」的重要，完全是技藝的模仿。康梁的維新運動在於變法自強，不過是政治的抄襲。這都可說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見解，雖在當時也自有其除舊布新之歷史的使命，然畢竟是皮毛的和改良的辦法，不能滿足當時的要求，於是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他以把中國固有的「從根救起來」把人家現有的「迎頭趕上去」爲前題，主張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作徹底的改造。

民國四五年之交，整個的中國陷在革命頓挫，內部危機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悶中，一般人以爲政治不足以救國，需要文化的手段，於是就發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縛爲中心的五四文化運動。經過這個運動，中國人的思想遂爲之一變。

新的覺醒要求新的活動，引導辛亥革命的中華革命黨遂應時改組，政治運動大爲展開。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聲浪遍於全國，由此形成了一個偉大的國民革命。其間雖有種種波折，但經過了這幾年的努力，中國的政治改造終於達到了相當的成功。

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着手，而且更爲迫切。但將如何建設中國的文化，卻是一個急待討論的問題。有人以爲中國該復

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爲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並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卻主張模仿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但其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

目前各種不同的主張正在競走，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而透過各種不同的主張的各種國際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躍，各欲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難道能讓他們去混戰麼？

三 我們怎麼辦

不，我們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們要求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在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應有這樣的認識：

（一）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

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

（二）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當竭力爲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三）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

（四）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

（五）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是拋棄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設中國，成爲一整個健全的單位，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要而言之，中國是既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這認識纔算得深切的認識。

循着這認識前進，那我們的文化建設就應是：

不守舊；
不盲從；
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
　檢討過去，
　把握現在，
　創造將來。

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不盲從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判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是要清算從前的錯誤，供給目前的需要，確定將來的方針，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着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枝最勁最強的生力軍。

王新命　何炳松　武堉幹　孫寒冰　黃文山
陶希聖　章益　陳高傭　樊仲雲　薩孟武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日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上海晨報

今天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諸君所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給了我們一個嶄新的認識，使我們知道目前的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並且使我們知道文化的領域中已『沒有了中國』

說是文化的領域中已沒有了中國，這雖然似乎有點過激，然其實也並不怎樣過激。因爲中國現在的輸出品，只有『古董，』其陳列在各國供人展覽的是有『唐人街』和『中國街』那唐人街或中國街裏面所用以代表中國和中國人的事物，是中國古代的建築，中國封建社會結晶品點的『同鄉會，』『中國下層社會最需要的『關帝廟』和『天后宮』這些事物之中，除却中國古代的建築還有其存在的理由以外，其餘都不適合現代人的需要，沒有感化別國人的力量；反之，中國現在的輸入品，都是現代人所需要的聲光化電之學，生產的工具，殺人的利器，適合居住的洋房，便利交通的汽車；在這情形之下，我們如果還自誇中國在文化領域中還有位置，那就眞是開着眼睛說夢話了。

中國在文化領域中，既失了位置，那『從根救起來』和『迎頭趕上去』的文化建設，就當然是必要的建設，關於這一點，『一十宣言』中，已擬了五項原則。第一，是直視此時此地的需要，把此時此地的需要來做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基礎；第二，是檢討過去的一切，發揚光大古代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淘汰古代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第三，是以現代中國的需要，來做吸收外來文化的標準；第四，是以新創造補祖宗遺產外人贈與的不足，並拿出最珍貴的創造，貢獻給世界，務使中國人能成爲文化生產者的一員，不再做單純的文化消費者；第五，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是使中國能在文化領域中形

成一個健全的單位，然後再用這個健全單位的力量來促世界的大同。

由這原則所產生的三個信條是（一）『不守舊；』（二）『不盲從；』（三）『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

我們由於這五原則之信條，可以知道署名在這『一十宣言』的人們，對於發揚光大舊文化所取的態度，不是提倡保留『關帝廟』，『天后宮』，『留辮』，『纏足』，也不是『整理國故，』而是承襲古人有價值的遺產，來供給現代人的生活需要，對於提倡新文化所取的態度，不是完全舍己從人的翻譯，不是連外國垃圾箱中廢物都完全吸收的『搬場，』而是收買原料再行加工加料製造的再生產。這種態度，是從前一般文化運動者所不具的。從前一般文化運動者，不是單純的守舊，就是單純的盲從，守舊的是連『留辮』『纏足』之舊都要守，盲從的是連外國最壞的制度都要從，不是『拚命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便是『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脚，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衆生的繩，把他們吊上光明溫暖的天堂，』根本上忘了『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忘了『從根救起來』和『迎頭趕上去』的重要。其結果一方使半個的中國，至今還保存着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一方使半個中國完全變成外來文化的殖民地。今天這『一十宣言』所以特地切切實實指出不守舊不盲從的重要，大約就是因為一方要解放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意識，一方要收回被外國文化所侵據的失地的緣故罷。

此外『一十宣言』中五原則的第四原則原文是這樣，『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我想凡是覺醒的中國人，對於這個意見都不會不有一番的憤發罷，因為現代的中國人，已成了單純的文化消費者，對於世界早已沒有珍貴的貢獻，並且連平常的貢獻都沒有，而今這『一十宣言』中竟又提到了『珍貴的貢獻，』凡是覺醒的中國人，又那能不有一番的憤發呢？

現在我們希望這『一十宣言』能發生一種普遍的影響，使中國本位的思想普遍生長於現代中國人的心中，並使不守舊不盲從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能產生一種足以蔭庇世界的最珍貴的貢獻。務使中國能夠復活於文化的領域中。

一月十日

中國本位的文化觀

杭州東南日報

國內十位大學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諸先生，最近發表了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生動感情的筆調，痛陳目前中國文化的危機，和建基於『中國本位』以重新創造的必要。『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這劈頭一句，就多麼說得動人；而使我們看了全文以後，更感到諸教授的煞費苦心，『在對面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蟄伏的嚴寒中』為着尋求光和熱而努力，尤其值得深切的敬佩！

可是甚麼是中國本位的文化，其內容如何？這似乎是研究本問題的中心，不容忽略。而諸教授給予我們的解答，雖然有滿紙『不守舊，不盲從，』『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種種好聽的客觀名詞，但嚴格說來卻祗限於提示一種研究的方法和應具的態度，並沒有觸着本問題的中心。誠然，我們要從事偉大的文化建設，這種客觀的態度和方法，是萬分必要的。但試想如名教授胡適之先生之流，他何嘗不口口聲聲以這種方法和態度自命呢？然而他今日發出來的怪議論，簡直紕繆百出，宜乎這次南下，要深受廣州學術界的冷淡了。可見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究竟是甚麼，如不能尋出一個正確的解答，勢必仍讓『各種不同的主張在競走；』結果當仍不免苦悶、摸索、掙扎，而中國就依舊是這麼一個混沌的『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

也許在各教授超然的眼光中，認定國內各派各系的主張，俱無足取；而所謂真正的中國本位的文化，還在他們的研

究竟中，要等到研究出一個頭緒來，再好發表一篇宣言，公諸大衆，然而中國截至今日爲止，果眞無一種眞確主張値得大家奉爲圭臬嗎？文化破產，危機已迫，還能容許學者們的從容應付嗎？這就是本文所要爲各教授宣言補充的地方。

我們不守舊，也不盲從，更不拘於一黨一派之見；然而在此敢下一斷語：目前所需要建設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化。因爲祇有三民主義，纔是東西歷史文化之綜合的結晶；祇有信仰了牠，纔能從縱的方面『把中國固有的從根救起來』，而非偏於守舊；橫的方面，『把人家現有的迎頭趕上去，』而不失之盲從。這點，在各教授宣言中，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也致了相當讚詞；可惜把整個三民主義的偉大性，在輕描淡寫的歷史分析中遺漏了；而最後的結論，又竟全沒有引伸到這方面來。

更具體地說：爲着文化的上進，第一，我們要發揚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固有的民族精神，參以近代西方的民族思想，而排除其狹隘攘奪的傾向，以建設民族主義的文化；第二，我們要繼承以孟子、黃梨洲、顧亭林諸先儒爲代表的民權思想，混合歐美德謨克拉西之精華而棄其糟粕，實現民主集權的中心政治，而建設民權主義的文化；第三，我們要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經濟思想爲出發點，融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制度，針對現實，以創造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而建設民生主義的文化。這樣，就『民有，民治，民享』的立場上，就形成了一個偉大的中國本位的文化系統，從而促成整個民族社會機構於充實健全，以邁進於世界大同的遠景。

我們所認爲中國本位的文化，意義如此，也就是爲總理中山先生根據科學的研究，反覆細繹，以遺留給我們的，要這樣，纔能『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而對世界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這質各高明的教授先生以爲何如、

一月十二日

中國之文化建設問題

上海申報

近來國內學術界輿論界，對於中國之文化建設，有一新覺悟，即中國之學術文化有獨立之必要是也。如蔡元培王雲五任鴻雋諸先生分別於東方雜誌教育雜誌上主張大學中創辦研究院，俾大學畢業生欲求深造者，不必爲遠涉重洋之留學，又如滬上學者王新命何炳松諸先生，則更在文化建設月刊上及本報教育新聞欄發表宣言，主張「採人之長，捨人之短，」以中國爲本位，而謀文化之創造。此種覺悟，蓋爲前此所不常見，實中國思想界進步之徵象也。

海通以來，中國以屢受異族之侵凌，不僅對於其固有之文化，喪失其信仰，抑且對於其民族性之優秀與否，亦發生極大之懷疑；於是不知不覺間對於外人之一切，無不致其仰望崇拜之誠。而於其本身之智能力量，遂失却其應有之自信。精神上既成他人之奴隸，則欲其有創造的能力，自爲南轅而北轍。實則，中國文化之發展，與西洋文化較，相距不及二百年；即西洋之文化，已進於機械工業時代，而我則以過去閉關自守孤立遠東之故，其文化尚停滯於手工業與農業時代耳。至於精神文化方面，其相差實屬無幾；此爲社會學者文化史者所公認之差別，故我中國今日之落後，決非民族性劣敗之結果；乃爲歷史發展上一時偶然之相差，苟能保持自信，「迎頭趕去，」則無有不能趕及者，如彼東鄰之日本，於六七十年前，有何文化可言！然於今曾幾何時，已與英美爭雄。可知苟自信而不自菲薄，必能奮發有爲也。故今後欲求中國學術文化之獨立與建設，必以自信爲關鍵，觀於近頃學術界之言論主張，覺其於此一點，已有明確之認識，此實大可慶幸之事也。

世界各國學問上思想上技術上之進步，日新而月異，以向來一切落後之我國，奔馳角逐於其間，猶有望塵莫及之歎，則欲謀學術文化上之獨立，固甚難，然苟能盡力推動，亦非絕無辦法，最顯然者，即對於外來文化之吸收（一）當視其是否切合於目今國家之需要，（二）當遵循犧牲最少收效最宏之途徑以進。我國歷來吸收外來文化，向以派遣留學生爲不二法門，學成歸國，社會往往視甚高，其所處之地位，亦往往獨優。故數十年來，不論於任何方面，均視爲一種特殊階級。於是青年學子，莫不以能留學爲光榮，而於其個人之所學，是否切合國家當前之需要，則不暇置問，結果，國家所亟須者爲工業技術人才，而社會充斥者則爲文哲法政之人才，一方仍感缺乏，一方已覺過剩，可謂國家個人，兩受損失。再則，留學生中

雖不乏眞欲出洋求學以謀世界文化之輸入者，然目的僅在混一頭銜者，實佔一大成分。即以經濟上言，亦屬得不償失，故我人於此，極盼國內各大學速設研究院，或就現有之中央研究院，加以擴大。俾國內大學畢業生之欲求深造者，有所問津。同時務使研究社會科學之學者，不必出洋留學，而學理工等實科者，亦可將留學額數，減至最低限度，務使事實上非出洋不可者，姑簡一二學有淵源之士出洋學習，或作一短期之考察，如是則每年千百萬之金錢，可作各種研究所科學院之設備費。

既有各種研究機關之後，則學者研究實驗，從事發明，皆能得所憑藉，由是早夕於斯，經過相當時期，則學術上之發見，事物上機械上之發明，必能相隨而起，較之負販學術之留學政策得失當不可以道里計。吾人敢信苟用此計劃，積以年月，必可使中國之學術文化漸進於獨立創造之境域也。　一月十三日

中國到那裏去？

上海時事新報

最近中國的文化界，誕生了一種新的文化建設運動，主張「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全文已揭露於報章，而引起了一般人們的重視，其宣言的劈頭一句，即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接着對於過去中國的文化，作一個提綱挈領的總清算，最後并表示他們的態度：「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語重心長的確是不同凡響的吶喊！

在文化的領域中，既然是看不見現在的中國，那麼，中國究竟到那裏去了？在宣言中，牠是相當的告訴我們關乎這個問題的概念。第一，牠說：『春秋戰國形成了我們的希臘羅馬時代，那眞是中國文化大放異彩的隆盛期，但漢代以後，中國文化就停頓了，』證諸漢武帝的尊崇儒術與罷黜百家，結果障礙了中國文化的前進，溯本窮源，則此種忠於歷史的敍述，誠非一般迷戀於封建殘骸者所能望其項背。

第二，牠匪特別祇向骷髏乞餘光，向牧師求解放，且於蘇俄的共產主義及德意的法西斯蒂，亦作有力的批判；就中國的立場，而提示我們應該走的道路，使中國從兩種國際思潮的逆流湍急中，航向民族復興的彼岸，其含義之深刻，似寓解脫因襲思想枷鎖的曙光。

可是，就一般文化發展的形態而論，新的文化的建設，往往是隨整個國民物質的與精神的生活發展而發展。因此，我們希望這個運動今後能夠超越著名的十教授，并透過知識階層而深入社會，去獲取牠的新生命；如果走到這裏，則不僅在文化的領域中，可以看見現在的中國，并且還可以看將來的中國到那裏去的遠景！ 一月十四日

如何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

上海新聞報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歸本於『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以期『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着重要的位置，成爲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枝最勁最強的生力軍。』此誠吾國文化運動者徹頭徹尾之新認識，亦爲推進中國文化路線正確之指針。輿論界對此，已有不少發揮與貢獻，請就管見所及，更進而補充之。

一民族不應拋棄其歷史固有之文化，同時應健全其文化單位之組織，盡量發展吸收世界文化之功能，尤應積極提高國民對於文化之觀念，以築成建設本位文化之底基。抑文化本身價值，貴有因時因地適於生存方式之制作成績，毋取空洞玄虛之抽象理論，否則無論爲守舊或盲從，非但不能改造社會、政治、經濟之組織與形態，抑且轉足錮蔽其國民思想或搖動其國民意識，基此種種，乃歸納爲如下之三點。

第一，宣言中斥守舊者爲拼命鑽入古人墳墓，欲向枯骨分乞餘光餘熱，此不啻爲迷信『半部論語足以治天下』者痛下針砭。實則古人制作，各自代表一時代之精神，其不合現實需要之陳言，要亦未許盡信，至眞正精髓所在，則爲吾民族

基本道德與其偉大思想，及蓄藏未宣之科學技術，均有待於剜苔剔蘚，刮垢磨光，以供建設中國新文化之礎石；固無事擲弄漢瓦秦磚，徒以眩惑當世為榮也。

第二，宣言中斥盲從者為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脚，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衆生的繩，把他們拉上光明溫暖的天堂。持此以衡量搬運外國文化者，成分不免過高。試遍閱坊間譯本什九多自日文轉譯而來，殊為文化界之奇恥。不佞嘗聞某學者編著中國哲學史，尚須搜求參考本於英倫，而日本對我文獻探討，遠較國人周詳，尤屬無可為諱。今後如何認清國際文化之對象，如何確立「搬場」工作之計劃，如何決定汰滓去毒之標準，如何培養「本位文化」之生機，皆從事文運者所當絞腦瀝心，嚴加自課其工作效率者也。

第三，吾國文盲遍地，亟應建立文化水準，以宏文化普及之效能，不佞曾著「文化建設之程序」一文（見去年三月二十九日新聞報社論）以為「貴族文化，徒加深社會階級之壁障，魔術文化，亦僅供學者名流之欣賞，在科學昌明如今日，征服自然與改善人生，固有待於窮追邁進，以求技術學理之益精，尤應確立水準文化，灌輸現代常識，養成良好之機體。」是則殷望負文化使命者不吝發揮其心腦熱力以惠普大衆，亦文化建設程序中萬不可忽略之基本工作也。

一月十五日

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

南京朝報

最近上海文化建設月刊發表一篇十位教授署名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他們的信條是：「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他們主張：「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華，同時對於歐美文化，取長捨短，擇善而從，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着重要的位置。」

對於這篇宣言所述的立場，我們大體上是贊同的；「不守舊不盲從，」這本是現代人所應有的態度，當然沒有再加

以討論之必要。但甚麼可算得是「不守舊，不盲從」呢？就中國的舊文化說，你以爲某種制度思想是渣滓，是應該淘汰的、却有人認爲這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偏欲加以保留。就歐美文化說，有人認某種思想制度不合中國國情，不合中國現時需要，偏有人認爲這是中國應該吸收的文化，像煞有介事的鼓吹起來。各人有各人的態度，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對於中國現狀的估計與觀察，各人又有各人的立場，然則所謂「不守舊，不盲從」應該如何解釋呢？這是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人所應該答覆的；尤其是發宣言的十位教授。

所以，我們認爲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有兩個先決問題。

第一，誠如宣言所說『中國不是任何一地的中國，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中國是現在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這段話是很正確的，要問中國現在應該建設什麼文化，必須先了解中國現在需要什麼，要問中國現在需要什麼，須先了解『此時』與『此地』的情形究竟是如何，亦惟有正確認識「此時」與『此地』的眞實情況後，始能指出中國現時需要什麼，始能指定中國現時應該建設什麼文化。所以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第一步，應該是『現時中國』的徹底認識，我希望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學者，對這點努力一番，指示出現時中國的需要，造成一個比較可以作爲中心的信仰。

第二，中國文化界最壞的現象是多說少幹，說起來儘管天花亂墜，實際上又拿不出甚麼貨色。不論是「德謨克拉西文化」「『普羅文化』，『民族主義文化，』都犯着這種毛病，結果『德謨克拉西文化，』弄到似是而非，『普羅』變成了『破爛』，「民族主義的文化」到現在還是空空如也。比方孫中山先生一生奔走，總算粗枝大葉的創造一種新的理論新的文化體系了，試問現在數百萬信徒中，對於眼前的文化遺產加以研究發揚者究有幾人？最近孔子又走紅運了，結果催忙着替孔子修廟，替孔裔冊封，試問有沒有一個研究孔學的人，在那裏幹「去其渣滓，存其精華」的工作？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是一個具體問題，最怕犯這種老毛病。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學者既有其所信，便應該老老實實地從事「去其

蕪滓，存其精華，取長捨短」的工作，多多拿貨色給人家看。

我們謹以十二分的熱誠，希望這一枝文化界生力軍努力前進，奠定中國本位文化的基礎。 一月十六日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回響

南京中央日報

在接受外來文化這一點上講，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清末的維新以至辛亥革命，實具有同樣的意義。爾其結局，日本因以日趨富强，而中國則貧弱益甚，這種理由如果用最簡單的話來解釋，便是在日本是自動的，而在中國則爲被動。日本因爲基於一種民族的自覺，振奮起來採取西洋的精華滲入自國固有的優長，而爲自主的，有計劃的改革，因此日本便安穩地享受了西洋文化的遺產。中國則不然，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無時不以文明古國自豪自誇而以野蠻鄙陋薄人，要外人進納歲貢，要外人行朝拜之禮，一心向「以夏變夷」而決不肯「變於夷」。及至鴉片戰爭以還，震懾於外國槍砲的利害，頓然失掉了本國的自信自尊，由懼外而媚外，由媚外而效外，起初還藉口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以自解嘲，慢慢地覺得線裝書有一併摔到字紙簍裏的必要了。

因爲基於這種心理而接受外來的文化，自然也無暇咀嚼，無暇辨別，囫圇吞棗，有奶者娘。我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只就國家的大法而論。日本明治維新，伊藤博文奉天皇命草憲法，穗積博士論當時的情形謂：「根據我個人的知識，我敢說當伊藤奉天皇之命起草憲法的時候，他所最致力的，便是對於那以皇朝底祖先所留下來的文化爲根柢的政府上的傳統的特質，以及現代憲政上的最進步的原則，予以一種調和。」（見所著日本法律上的祖先崇拜第九三頁）足見一面雖採取新的進步的思想制度，然而一面還是保持着自國歷史沿傳的特質。因此日本憲法從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公佈以來，能一直奉行到現在。而中國則自清季憲政運動以還，時而採取日本式的天皇制，時而採取英國式的內閣制，時而採取美國式的總統制，時而採取蘇俄式的委員制，條此條彼，朝令夕改，民國建立二十四年而至今未曾有一部正式

的憲法。政治是如此，其他如教育，社會事業等，沒有不在許多名詞裏翻筋斗。各種各式思想制度在外國行之數百千年，分別爲一十餘國者在中國一國中卻能在短短數十年內搬演殆遍，終至行行不就，百無一成。這就因爲中國在國際勢力的宰制之餘根本自己就喪失了羅盤針，東風吹則東倒，西風吹則西倒，沒有一個確定的方向，外交上決不定事齊事楚，文化上也決不定此是彼非。各帝國主義資本勢力攜毀了中國的經濟機構，使成爲隸屬化的經濟形態，各帝國主義政治勢力又拆破了中國藩籬，使成爲遠東大角力場，文化在中國也就變了各種各色的雜耍舞台。

然而又何必高談文化，只就具體的日常生活而論，也已『沒有了中國』。衣、食、住、行民生四要事，事事都洋化，尤其是喜談文化的知識階級，那裏還見得多少『中國』的影蹤兒。

建設以中國爲本位的文化，還正足以表明中國知識階級新的覺醒，也是民族革命中的有力的掙扎。不過蹤跡中國文化之所以淪落泊沒的原因，就應當明瞭要建設中國爲本位的新文化，還該先突破帝國主義勢力的羈勒，而解放出眞正獨立光榮的民族。否則在外來勢力高壓下面，買辦階級洋奴漢奸耀武揚威的時候，國人競務洋化，只恨得父母生下來並不是碧睛高鼻，這點先天上的缺憾，那裏還肯屈尊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瞥上一眼？隸屬化的經濟機構與次殖民地的政治形態下面，是不會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 一月十七日

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

漢口太同日報

文化這樣東西，牠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按之古今而咸宜，是以時代與環境爲條件的。以空間來講，甲國所結晶之文化，不盡適合於乙國；以時間來講，農業社會之文化，定不適合於工業社會，最近兩三百年以來，歐美一般國家之文化，飛也似的朝前進展，由家庭工業進而機器工業，更進而達到電氣化之境界；而老大之中國，則迄今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以致海通以後，中國固有之文化，隨處都是破綻，隨處都是弱點。這是中國文化，沒有把握住時代所受的一個教訓。鴉片戰爭以後，

國人之自尊心，突變而爲極端的自卑；時而學外人之洋槍大砲，時而學外人之立憲共和，一變再變，甚麼都變到了，而中國之積弱不振，依然如故，甚至江河日下，不堪回首，這可是中國文化沒有把握住環境所受的一個教訓。因此，本報在數月以前，對於文化建設的路線，曾提出一個意見，就是：『在觀念上，恢復民族自信，在方法上，努力適合現代化，不固執成見以違反世界之潮流；不數典忘祖，以毀滅光榮之歷史。』現在讀滬上十教授所發關於文化之宣言，及各同業所發抒之意見，足見得我們這種主張，已有廣大的同情，這是我們所深引爲慶幸的。

以我們所見，中央應當在這文化建設的氣氛十分濃密的時候，以極大的注意力，促成下列兩事的實現：一、成立文化委員會，廣延國內碩學之士，以集中文化建設之人材；二、決定目前之文化政策，以端文化建設之趨向。以上兩者，我們認爲是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所必採之途徑。倘不然者，一採放任主義，守舊者任其守舊，維新者任其維新，則雖有少數苦心孤詣之士，熱心倡導，而中國之文化，仍將永遠在歧路中徘徊，得不着光明之前路。　一月十九日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問題

上海中華日報

文化是經濟政治乃至社會機構的複寫或反映，因之，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機構之變動，達到了某一階段，則必然地提起文化的改革。中國固有文化跟着中國固有社會機構的變易——自鴉片戰爭以來，正像木乃依之接觸了新的空氣一樣，消解了，變質了。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中國迅速地殖民地化，同時，中國文化也必然迅速地跟着『殖民地化』。這是難於否認的事實。數十年來，主要是鴉片戰爭以來，所謂『中國文化』，決不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而且誰也不能承認是純粹的西洋文化，更不是西洋輸入文化和中國固有文化自然混合而成的一種混和文化，而是建築在帝國主義者列強底侵略的經濟條件上的文化。接着辛亥大革命直前的一個期間，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勢力更形蓬勃，待它們爲保存作爲其侵略的最好對象的滿清木乃依，而盡力援助其肅清反政府的革命運動時；列強底侵略的文化，也就即刻跟着將中國封

洋文化，迅速地完成了畸形的結合，結果形成了一個建築在滿清殘骸之上的政治運動。前者是以軍閥階級曾國藩李鴻章爲首領的「洋務運動」，後者是以封建的士大夫康有爲梁啟超爲首領的君主立憲派——「維新運動」。這二個運動都是有政治運動的外貌，而這二個運動都踏進文化運動的領域。固然，康梁的維新運動和曾李的洋務運動，在本質上擁有不能苟同的內容，但二者又並不是沒有共通之點，其共通點便是二者都人爲地把當時輸入中國的西洋文化結合到中國固有封建文化去，同時，又因着滿清王朝對帝國主義者的經濟的奴隸化與隸屬化，結果，文化的領域也祇有隸屬化與殖民地化了。

但是，另一方面，卻在資本主義列強分割中國的過程中，又卻形成了孫中山先生爲領袖的革命運動，這革命運動在表面上雖則單純提出倒滿的倒封建的口號，但無可懷疑的是列強侵略中國的結果。然辛亥革命雖告成功，而封建的殘餘勢力仍然在列強保護之下而把握於北洋封建軍閥的手上，所以當時在文化上表演最起勁的，是從事媾合西洋文化與中國封建文化。可是，當時中國南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已走進了另外一個領域——民主主義的，解放被壓迫民衆的徹底反封建的領域，同時，文化方面，也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澎湃着民主主義的反封建的思潮。

光榮的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我們應認爲反封建的自由主義思潮澎湃的結果，也就是封建的與反封建的二者在文化領域中爭取領導權的最後營之表演。然而，我們很明白，五四運動不但思想上是反封建的自由主義的解放運動，同時也是一個反封建的政治運動，一個反對列強侵略中國的反帝運動，並且是一個給帝國主義者與封建軍閥聯合戰線以莫大打擊的對外運動。因此，在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列強重重關係之下，五四運動不能有徹底的成功，在積極方面不能徹底建樹適合於新興的中國的文化，並無須如何論述。但是，卻爲着這點，中國文化的建設便由於列強的威脅與國民革命的阻折而拖延到現在。

在政治上中國統一運動成功以來，中國開始了文化建設的呼聲，尤其是這數年來最烈，但還沒有人提出過一個文化對

象，中國現在需要怎麼樣的一種文化。現在「一十宣言」又從新把這問題提了起來。在該宣言中，雖提出了中國意識形態的獨特性，雖需無完備的打擊了那些忽視中國空間時間特殊性的盲目模仿，雖提出了作為中國文化最終目的之大同主義，雖提出了作為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方法之批評態度和科學方法，但問題的核心，還非常含糊。中國需要怎麼一種文化呢？適合現階段中國的文化應建築於怎麼一種經濟基礎之上呢？關於中國固有文化的徵前與承襲又應以何者爲尺度呢？這種種主要問題，還依然沒有解決。不過，這總是一種比較進步的表現，我們希望「一十宣言」諸君將來的成功，完滿過去現在所企圖的一切。　一月二十日

光榮偉大的使命

金華浙東民報

自從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後，已引起全國人士的深切注意和評論，宣言中分為三部分，一是「沒有了中國」在劈頭的一句話就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此語對於中國現狀的認識，可以發人猛醒；二是『一個總清算，』提綱挈領的清算過去的中國文化，爲一般向骷髏乞餘光，牧師求解放者痛下針砭！最後是『我們怎麼辦，』纔提出他們具體的主張，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原則。

這是確實的，中國文化現在精神之日漸喪失，民族自信力消滅的危險日益嚴重，是伴隨着國內農村經濟之崩潰以俱來的。當目前內憂外患交迫之下的中華民族，已經跨入了歷史的新階段。那種陳腐的封建殘骸，已不能適應新時代民衆的要求；而乞靈於萬能的牧師，也只有使中華民族永遠陷入無可拯拔的境地。

現在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已經萬分的迫切。在努力從事於經濟機構的改造中，同時決不可忘懷了新中國的文化運動，精神物質兩方面同時並進，纔能奠定中華民族的新生命。關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精髓，固當竭力之所及，發揚而光大之以貢獻於全世界。而於二十世紀的西歐科學精神，更須迎頭趕上，採取我們所需要的精萃所在，把它吸收過來，這便是

這事與本會從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準備工作，十教授的宣言，正足表示在復興中華民族的程途中，全國民衆對於新時代文化的熱烈需求。

中國本位文化的基礎，誠如十教授所說的，「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我們建設二十世紀中國的新文化，要認清當前的環境，發揮獨特的創造精神。最後我們還要記着大同的理想，完成將來光榮偉大的使命。

一月廿一日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上海民報

國內十教授發表『一十宣言』後，國內報紙爭相轉載爭相批評，由此可見其影響之大，感人之深，十九日第一次文化建設座談會所討論者，尤爲近實際問題，吾人不可無一言。

『一十宣言』內容，誠如金通尹先生所謂：第一段對於中國病症之診察；第二段係述已往治療之經過；第三段係指示今後治療之方針；在此三段文字中，吾人誠有若干意見，欲就正於各教授；唯一般人對此宣言，殊嫌其空洞不切實際，如沈尹默先生謂：一十宣言之原則，無不贊成；但將如何使之具體化則爲最大之問題。倪文宙先生謂；一十宣言僅有抽象之理論；傅東華先生謂：專講原則，沒有用處，必須在設定原則之後，能拿出具體的方案，並能實行具體的方案，纔有用處。陶百川先生謂：十教授如能更有一補充的具體的宣言，示人以最高指導的原則，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伍蠡甫先生謂：一十宣言的理論固美，但我們希望這宣言不只是天花亂墜的理論，而是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案。

在座談會中固不能不有此討論，但吾人以爲此不足爲一十宣言病。十教授中之王新命先生在新人週刊發表『我的民族主義文學觀』，有謂：『我們的民族已陷絕境，要力圖復興，力爭生存，意識上的呼醒，感情上的推動，當其必要。』此

無負於說明十教授之使命，十宣言之重要點即在此

此在吾人十教授之宣言中，本有以三民主義為文化建設之最高原則之意嚮，如稱中山先生以「迎頭趕上去」為前提，主張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作徹底的改造；又稱國民黨改組後所領導之國民革命，經過幾年努力，中國的政治也遂終於達到相當的成功；最後並稱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能捨棄大同的理想者是。但經陶希聖先生之提議，主張以三民主義為文化建設的最高指導的原則。最後經主席何炳松先生以誠懇態度，明白接受；有此明白之修正，吾人尤極表示絕對的贊同。　一月廿三日

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

上海江南正報

一星期前，中國教育界王新命、陶希聖、薩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發表宣言，提倡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舉國同業，苦於國內政象沉寂，無可討論，乃移轉眼光，注視此十大教授提倡之本位文化問題。雖發言各異，而表示贊同之一片熱忱，則甚致相符。江蘇省政府陳果夫主席，亦特別通電，作贊同之表示，並謂努力於此種本位文化之建設，必能為中華民族，展開一條新的途徑。可見此種問題，未容貶視也。

誰都知道一個民族的盛衰存亡，不純粹取決於民族之武力運動。所謂民族文化，乃其中最關重要之條件也。從中國歷史上查考，如漢如唐，可稱兩個極盛時代。論其武功，固然威震遐邇，懾服四夷。若就文化方面觀察之，商隣各國遣使至京留學者，絡繹不絕於途，中國文化，堪為四週隣國矜式，不待問也。趙宋元明清各代，中國本位的文化，逐漸消亡。辛亥肇建民國，使優越之文化，不再受異族之統制，收復河山，還我舊物。一般中堅人才，奮起而復興本位之文化。民族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者，文化建設之關係誠遠也。

獨惜乎海禁大開以還，歐美文化，如疾風驟雨，飄忽而來，電化聲光之科學，攻破中國固有的本位文化之壁壘，昧於本

位文化之亟須建設者，方且故步自封，夜郎自大，遺棄原有之精華，拾取他人唾棄之糟粕，一而再，再而三，愈進愈速，變化愈奇，變化既奇，而文化日即趨於滅亡矣。文化既瀕於淪沒幻滅之惡劣環境，民族之頹廢病狀，遂暴露無餘。有心者謂中國民族之墮落，由於文化之先期敗露也。文化既繫本位之精神，隨着歐風美雨席捲而歸於淪胥，中國黃炎以來之民族生命，豈尚能保持一絲一線之生命耶？

吾人對於中國文化之急須建設，而一再著論及之，吾人一得之愚，以爲建設文化，須注意尋求路線，路線安在？即是在觀念上應恢復民族之自信力，在方法上應努力適合於現代化是也。果能向上進展，不固執成見，違反世界之潮流，不數典忘祖，毀滅光榮之歷史，文化何至隨民族同歸於盡耶？今居於社會導師之十大教授王新命等，不從此種路線努力，徒發宣言，有何裨益於文化之建設乎？

故吾人以爲中國際茲文化建設空氣十分濃厚的今日，須厲行下列的兩個信條：第一，創立文化委員會，延攬碩學宏儒，集中人材；第二，決定具體的文化政策，整飭文化趨向。倘不從速實現上述兩個信條，雖署教授頭銜如王新命之輩，朝發一宣言，夕發一主張，文化終於晻曖日影，與民族俱亡矣。噫！ 一月廿四日

中國文化運動之新開展

天津大公報

現代中國文化運動之全般的發生，應斷自民國八年之五四運動前後——此殆爲多數讀者所同認。今若以五四運動時之自由主義的，合理主義的，亦即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爲起點，而一觀中國文化運動之史跡，則在大體上顯然可分爲四大段落：一爲五四運動前後之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時代，二爲由民國十七年到二十年間之社會主義的文化運動時代，三爲民國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間之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時代，四爲從本年起到未知何時止之「中國本位的文化」運動時代。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運動，目前正在開始時期，且事實上係與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團體即中國文

化建設協會合作，故是否能獨立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似尚難免有人懷疑，然依十教授之宣言及吾人所知之消息觀察之：今日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運動，在本質上似應認爲另一種獨立的文化運動之起點，蓋因不但十教授之思想及行動固非全遵三民主義的途徑，且其負責發表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關於文化建設應有的認識五點及其主要方法之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判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等等，尤其在「沒有了中國」的肯定語氣中，亦顯然與數年來之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團體之見解相異，似不能混而爲一也。吾人以爲「中國本位文化運動」之所以能在發起後數月間轟動全國者，實亦因其爲另一種文化運動之故，前月三十一日北平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座談會所以能成一近來稀有之盛大而冷靜的會合者，亦未嘗不出於同一理由。故由此種意義言之，吾人應重視此種運動之展開，同時爲促成其展開起見，應指出其缺點並提供吾人之積極的意見。

如以北平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座談會之經驗爲根據而下判斷，吾人對於此種文化運動之努力上或覺其有三種缺點：第一，發起人過於謙遜而表示無充分自信的態度；例如陶希聖先生在短時間的報告當中再三申言發起人之目的只在引起國人討論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之興趣，而不在具體的建設何種文化，則其明證。吾人以爲此種態度實與運動之目的相反，因如發起人本身無努力建設某種文化之自信，則當然談不到使人參加建設運動，而結局將變爲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也。第二，主持者過於無準備；座談會雖以在座者俱能自由發言爲主旨，然此種主旨在事實上決非用自由放任的漫談的方法可以達到，而必須事先將總問題中的各細題，提綱挈領預爲排定，臨時依排定之次序，提出請衆人隨意討論，始可。否則詳細題目不定，時間又促，不成爲少數人無題的亂吹，必成多數人無聊的緘默。第三，始終在問題本身上未談到中心問題，在談話方式上未達到討論的地步，結局只成了有名無實的座談會——此或係第二缺點之必然的結果，然赴會者一般之無決心無準備，當亦爲其原因之一，於此吾人不能不期望負文化責任之大學教授等此後能更積極的負責也。

從積極方面言之吾人以爲從事「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者，應使文化界人士注意並解決以下六種問題（其實只是一個問題之六種方面）：（一）爲文化建設運動之根本意義何在？在文化本身？在文化以外？在民生？在民族的興亡？甚至於在運動者本人的福利？等等問題；此種問題如有正當的解決，則文化界中人自能景從。（二）爲「文化」之意義如何？指生活樣式？指意識形態一般？指倫理道德？指科學哲學？指藝術文學？指精神？等等問題；此種問題有確答，則運動重心自能確定。（三）爲在現階段上的（不是現在的）中國所需要的文化是何種文化？是全盤的西洋現代文化？是古代中世的中國文化？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文化？是裝門面的文化？是能解決目前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像劉逯事件所表現的男女問題的文化？等等問題；此種問題如能解決，則可免人指「中國本位」爲空洞，爲抄襲。（四）爲文化發展變化的原則如何？係一成不變？係依文化自己之力而變？係依倉廩衣食等經濟情狀而變？係依外來優等文化之壓迫而變？等等問題；此種問題如能有確答，則文化運動之基礎便能鞏固。（五）爲文化與政治之關係如何？文化全部或部分受政治之支配？抑政治一部分受文化之影響？政治上某某主義（例如社會主義）的文化完全可以存在？抑完全不可以存在？抑只一部分可以存在？政治對文化應放任，抑應統制或誘導？等等問題；此種問題之答復如能明白表示，則中國本位文化運動始能祛自由主義者之惑而解文化界對文化統制之疑。（六）爲文化建設之實際方法如何？依少數負文化責任者之指導？抑依大多數國民之實踐？依常川的努力？抑依一時的衝動？等等問題；此種問題如能有正確的解答，則對於文化運動團體之組織及其活動，當能發見其與普通團體不同之處，而作合理有效的處置。

此後作中國本位文化運動者如能消極的免除北平座談會之缺點，積極的答解上述六種問題，則中國文化運動或將有更進一步的開展歟！

四月三日

論中國本位文化

西安西京日報

最近滬上學者王新命何炳松等，因鑒於中國文化之衰落，與夫政治形態，社會組織，與思想內容，都失去其民族應有之特徵，爰特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見文化建設本年一月號）以期適應於中國之文化體系。自宣言發表之後，各界人士，莫不如飲一劑清涼散，相偕斷斷，共同探討，以謀確定今後中國文化之動向。要如何建設中國本位之文化？宣言結論中已指出其大綱，曰：「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其終極目的要在「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着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枝最勁最強的生力軍。」此種認識，可謂最近中國知識界之新覺悟，今而後如能循此轍的以進，則中國文化必將有放射異彩於世界文化領域之一日。

中國文化，至今已衰微極矣！舊文化業已中斷，新文化尚未產生，在此青黃不接之時，中國文化之趨向，誠有深加探討之必要。若一味復古，則「半部論語治天下」之時期業已過去，不得再求；若專事搬運洋貨，則非特社會背景所不許，抑且為時代巨輪所難轉。其結果，非食古不化，即削趾適履；非視糟粕為奇珍；即畫虎不成反類犬。甚矣哉，文化之難言也！今王何諸氏，將中國文化史蹟為窮本溯源之追究，將近代西洋文化為客觀科學之分析，知文化之時間與空間為不可譭也！贊美過去，徒增感慨；詛咒過去，亦係枉然；要把過去陳列在顯微鏡下，孰去孰存，為精詳之檢別，并將西洋文化置諸濾濾器中，去其渣滓，存其精英。今日之文化運動，乃顯微鏡與濾濾器之運動，然後將過去與現在，東方與西方設法調和，再加之一番融會貫通之工夫，斯則適合於現時代，適合於現中國之文化產生矣。

統觀宣言內容，其隱約偏重者，大抵皆偏於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方法論。對於今昔文化之解剖誠詳盡矣；而關於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目的論，則尚嫌不足，記者不敏，願於此進一言焉。夫文化者，人類生活核心之外表也；換言之，亦即學術與技能之總和也。人類無時無刻不在學術與技能中求生存，學術幼稚，技能低落，其生活之難與人競，自為必然！今吾人縱有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方法和決心，但缺乏一共同觀念為之規範，則雖有中國本位為之前提，亦將各是其是，各

非其非，而無所適從矣。觀乎中國年來學術界之爭論，與夫思想界之錯縱，誰不曰我爲救中國耳！我爲救中國耳！在此種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之觀念下，而欲產生統一之中國文化體系，皆緣木而求魚！中國之現狀，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際上，均須亟求解放，如知識界諸子，皆能在此共同信念之下，身體力行，則對過去與未來，東方與西方，咸得其取捨之道矣。

抑尤有進者，在今日文化領域之中，久已不見中國矣；故今日中國文化運動之急務，即爲如何建設中國之新文化。自蘇俄實行五年計劃而後，統制之潮，瀰漫全球；國內之務新者，亦欲及時而動，以一嘗統制之滋味。以吾人之觀察，處此國際經濟戰日益激烈之時，若求國內產業之保護與發展，則採取統制尙矣。惟在文化領域上言，中國文化已荒蕪不堪，當前之所應積極努力者，乃爲如何以求中國文化之起死回生，決非統制以求中國文化之集中化也。願今之言文化統制者，放棄其統制口號，致力於建設中國本位之新文化，俟過相當時日，然後再言統制，亦未晚也！　一月二十日

再論中國本位文化

西安西京日報

自滬上十位教授署名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後，一時頗引起國內輿論界的注意，本報於一月二十日社論中，亦曾論及，認此乃爲中國知識界之新覺悟。蓋文化建設與物質建設是同樣重要的，是相互關聯的。中國今日需要物質建設，但也需要文化建設。文化進步，可以促進物質建設；物質建設進展，亦可以提高文化程度，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在中國近年來的建設高潮中，竟忽視了文化建設，這不能不令人遺憾。最近十位教授所發表的宣言，實乃中國今後文化建設的曙光；惟我們對此問題，尙有數點意見，貢獻於努力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諸公之前：

第一，中國雖是中國，但也是世界的一環，我們亦應注意其相互關聯之處，不應只看中國，而不見在中國之外尙有不可分離者在。蓋自滿清入主中國之後，許多明室遺民，流亡海外，從事於恢復漢族江山運動，清廷爲防止當時這班遺民起見，乃實行封鎖政策，使中國與海外隔絕。從此後，中國成爲中國的中國，而非世界的中國了，在文化上、中國亦與世界絕緣，

結果使中國人對世界情勢，茫無所知，在中國的歷史上，關於中外關係的記載，亦大都誇大其詞，中國人既不明瞭世界現勢，復昧於過去的事實，乃養成夜郎自大的習性。直至十九世紀以後，列强資本主義的軍艦與商品，將中國的銅牆鐵壁打破，自此，中國的門戶洞開，迫得使中國不能不再走進了世界舞台。

第二，對過去的中國文化，固然應該加以檢討，但對於過去及現在的中國整個的社會，亦應該加以徹底的算清纔是。蓋文化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總成績，在某種社會中，就會有某種文化產生，封建社會，決不會發明蒸氣機，一定要到資本主義的社會，纔能發明，而被普遍的利用。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過去一向很少有人注意，直至近數年來，方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加以研究。但亦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數年來的論戰頗烈，尚無相當結果。對於中國過去及現在的社會，既沒有徹底的認識，則不能知外國文化，何者是中國所需要的，何者是中國所不需要的，若將中國所不需要者，也要拉來應用，豈不是盲人瞎馬，愈弄愈糟嗎？而中國過去數十年中文化運動的失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第三，我們更要徹底的認識外國文化，牠的基礎是什末，牠又是怎樣形成的。「取長捨短，擇善而從，」這種態度是對的。不過所謂『長，』所謂『善，』亦有牠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並不是絕對的。在人家所謂『長，』所謂『善，』拿到中國來，不見得也就是『長』與『善』的。過去數十年中，又何嘗沒有將人家的『長』與『善』搬到中國來，但又有什末結果呢？故我們應該從根本上去認識，知己知彼，而後方能確定什末是我們所需要的，什末是我們所不需要的。

最後，『關於中國本位是什末？』在那篇宣言中，並未明白的指出。『什末是中國本位？』這乃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則根本談不到什末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是幾個人的力量所能解決的，故我們希望中國的全體知識份子來個總動員，以求得一個答案！　二月十一日

論本位文化

漢口武漢日報

最近關於中國文化問題，國內學術界言論界，頗多探討，或倡「全盤西化」論，（陳序經是）或持「實質西化」說，（張佛泉是）上海存文會且認尊經諸子百家，為中國文化之最高的結晶因有普及文言教育之主張，各執一偏，聚訟紛紜。中委陳立夫先生，上月十七日在中央黨部紀念週闡明中庸「誠」「形」「著」「明」「動」「變」「化」之理，倡言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需要；王新命何炳松等教授發表「一十宣言」，亦以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為職志；上週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欄所載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復從而非議之。吾人以為一國文化，每隨時代環境而演進，本非一成不變者。但新舊取捨，空間時間，亦各有其因宜，未可持一偏之論也。

吾人固同情於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也，然對於新舊取捨之爭，以篇幅所限，姑不參與論戰。第就今日一般社會言之，深覺中國無一不在「精神的無政府狀態」之中，尤以青年男女社會為甚。或誤解自由，縱情浪漫；或意志薄弱，挺而走險；或迷戀禮教，自絕生機，而一般社會中堅人物，猶復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社會思想，既失中心，共同信仰，斯無從而樹之矣。以言本位文化之建設，是誠有其需要也。遠者不論，徵以近事：如危文繡之再醮，法律人情，兩無可議，然不免於地方之驅逐，輿論之譴責；熊希齡以過去曾為內閣總理，衰年續絃，得女教授毛彥文為婚配，反蒙社會之讚許，此何說也。阮玲玉以人言可畏而自殺，張（達民）唐（季珊）若置身事外；劉景桂懲無義男子而行兇，逯明究難逃法網，又何說也。牛桂珍遺嫁樂林和，尚遭親權反對；劉尚彰甘墮落娼寮，且得社會同情，又何說也。他若少女殉夫，青年婚變，或揚或抑，或褒或貶，因人論事，靡有定評，是舊道德之深中於人心乎？抑新思潮有以推其波而助其瀾乎？一言以蔽之曰：中國無本位之文化為之厲也。

吾人抑知文化之為物，是人類思想與生活之總和，而思想與生活，甲與乙異，乙與丙異，固未可強而從同。然人類不能離社會而存在，自必有其共同之關係，在此共同生活之下，亦必有其共同之中心思想與信仰，團結一致，從而謀共同之生存與發展，基此共同中心思想與信仰之內在因素，形成政教風俗等等之外表徵象，是即吾人所謂本位之文化也。使文化失其本位，則民族精神必陷於無政府之狀態，國家社會，亦將淪於紛亂悲慘之境域。今日中國一般社會，依違於新舊之間，

所以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思想的內容，生活的方式，五花八門，陳雜並奏！及今不圖，其何能國？胡適視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謂爲「大言不慚」，然則彼所倡之新文化運動，倡在二十年之前，不亦「無病呻吟」乎？於此以見中國學術界「入主出奴」之見，千古一轍，可慨嘆也！ 四月六日

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馬望

一月十日有十位教授發表宣言，主張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

他們說中國不應該復古「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他們說中國不應該模仿英美「英美因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並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變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他們又說中國也不應該模仿蘇俄或德意，因爲作這種主張的人的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

他們的積極主張是「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

對於這十位「要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的教授的好意，我們自然是十分感謝的，但是當我們預備贊成他們的主張的時候，卻又覺得他們的主張欠具體欠着實了。

古既不復，舊既不守，對於歐美的文化又不主模仿，那麼我們用什麼東西來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誰又能夠憑空創造出中國文化的特殊原素呢？今日的中國固然有其空間的和時間的特殊性，但所謂空間的特殊性，是陷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所謂時間的特殊性，是處於事事落後的階段。那麼，我們是不是要適合這空間和時間的特殊性，建設次殖民地的落

後的中國文化呢？

但十教授當然不作如是想，而且也並不想還奪創造中國文化的新原素。他們有「大同的理想。」他們取「迎頭趕上」的方向；而且他們的不復古，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他們對於歐美文化，仍主「必要而且應該」去吸收，「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

我們不要以爲這是十教授的自相矛盾麼、他們的主意很明白：「古不可全復，歐美文化不可全盤承受，一切須以現代中國的需要」爲標準，而決定當存當去。」

還當然是極對的。但是什麼是「現代中國的需要」呢？

十教授可沒有指出，他們還不曾期定標準。

因此我們覺得，他們的宣言欠具體，欠切實。因此，我們還得請十教授拿出具體切實的標準來，

但僅有標準，也還不能談文化建設，文化的建設，是要有它的經濟基礎，（如十教授所說，歐美的文化是基於工業的）和政治環境的。而現在的中國，卻正陷於國民經濟破產，政治主權削弱的時候，如十教授所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在經濟和政治的領域中，我們也不看見現在的中國了。在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總侵略之下，我們如何能夠從容地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呢？

十教授的宣言中說：「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方面的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着手，而且更爲迫切」。這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工作自然都是中國本位的，但我們以爲今日最迫切地應講中國本位的事情是

中國本位的領土保全

這就是說，中國應該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都應該以反帝圖存爲標準，否則，侵略日甚，抵

抗不施，將來弄得連領士都不見了，還有什麼中國本位？還有什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申報月刊二卷三期）

讀十教授宣言後

李紹哲

一月十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人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是新年來第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該宣言指點出中國文化運行的動向，最少可以代表大部分在文化領域活動者之願望，作者於讀該宣言後略有感想，因述於後。

宣言中分三部分：一是『沒有了中國』，可算是對中國文化現狀的認識；二是『一個總清算』，可算爲對中國文化運動的批判；三是『我們怎麼辦』，可算做對中國文化建設的原則；亦即十人對中國文化運動的見解和信念。

無可諱言的，中國文化特殊精神之日漸喪失這個事態是正在發展中，民族自信力消滅的危機日益嚴重。文化，是民族生命的表徵，文化的光芒消逝了的民族，絕不能屹立苟存於世界，混亂而且走着沒落的趨向的文化正是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的混亂互爲因果。所以，文化的改造，就是國家的改造；文化的建設，就是民族的挽救，中國的國命危如累卵，即是文化病入膏肓的成果。我們需要的文化，是『中國』的文化，是『現代』的文化。因爲是『中國』的文化，所以不迷戀盲從外來的思想；因爲是『現代』的文化，所以不挖掘死守古人的骷髏。故而，尊事趨新者固非，拼命守舊者亦不是，從事中國文化建設，應持中國的立場，應抱批評的態度，十人宣言，大旨上我們覺得是很可贊同的。

作者嘗默察國內極度動盪中思想之演變，覺得年來有一可喜之現象，就是伴隨着國際環境之險惡與內部局勢之安定而來的思想之日漸穩健，由叫囂高調空論時代走入切實篤行事實階段。大凡一種思想主義，都有他的理論根據，不過豐富的理論，要有實際的性能，超時空的理論，那終不過是一種理論而已，儘管立場不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着邊的爭論，永遠的祗有混亂。從事文化批評建設運動，應有三訣：一日切實際，二日更切實際，三日最切實際，尤能不忘了自己、

不忘了現實的自己。

思想混亂的原因在那裏呢?要解救目前的自身,不爲千百年後的子孫建立文化,我們不需要趕時代的思想,要改造當前的環境,不爲異族製造奴隸,我們不需要離空間的學說,還是肯定自己立場的前提。我們要求廓 一切浮泛自欺的高調,那就是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換句話說,就是科學的精神。以科學的精神,打破一切主觀的囈語,成見的惡魔,不負責任的空論,肆意倒亂的謬說。我們希望從事文化建設運動的人們,不抄襲,不蠻做,不貪古不化,不生吞活剝,勿忘了自己,勿忘了現實的環境,以科學的精神建立中國獨特的意識形態的文化,然後才可以立己,才可以達人。 一月十五日

讀『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後

葉青

一月十日,上海、南京、北平文化界中人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人,曾發表有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於申報和文化建設等報紙上。我讀了過後,覺得它有一種歷史的重要性,不可不加以注意。

一月十九日,他們舉行了一個座談會,徵求文化界其他人士對於那個宣言的意見。我當時沒有準備說話,只是臨時發表了一點感想。那是聽了何炳松先生報告各日報對該宣言的評論和與會的劉湛恩、舒新城等先生的意見而說的,很不完全。現在我想把我讀了那個宣言以後所感覺到的,作一簡單的系統的說明。

中國原是有文化的國家,大概誰也知道它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之一吧。它開化得很早,而春秋戰國確形成了它的黃金時代,酷似歐洲的希臘羅馬期。這一點,我在我的胡適批判一書上,曾作過哲學的對照。然而以後由漢武帝至清道光,就轉入黑暗時期去了,其情形又活像歐洲的中世紀。這時的中國文化,完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及到與近代的歐洲文化相遇,遂大顯其拙劣,而着着失敗。

這背，中國學者有了兩種意見：一種主張採取歐洲文化，一種主張保守中國文化，後一種意見是因前一種意見而有。它和西者互相爭論，雖然在事實上前一種意見業已獲得勝利，可是經過很多曲折，後一種意見時時都會昂頭起來，因此，直到現在，可以說這兩種意見還在爭論而沒有解決。

它一方面，在這種爭論中，當前一種意見獲得勝利時，又來了社會主義思想。它在中國，有十幾年的歷史，而俄國革命後的建設，又把這種思潮具體化而為一個俄國文化（姑為此名）了。這也使中國方面受其影響。

不止這樣，繼俄國革命而起的意國政變，又提出了一種法西主義。十年有多的努力，在歐洲形成一種特殊的色彩。不管它的特殊成份有幾多，總之是很引人注目的東西。從德國及其他國家或多或少的模做上，還可以看出它是有世界性的呢。這大致可以叫做意國文化（姑為此名）吧。而在中國近二三年，也有人在那裏介紹、宣傳……不用說，中國因此又添了一種意見。

目前呢，因為中國在長期的變動時代中，任何一種都還沒有定形化。而且任何一種都在奮鬪，以圖取得生長繁榮的機會，因此，在文化界呈出了五花八門，莫衷一是的樣子。究竟怎樣呢？在一般人，確是一個問題。

在這時候，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先生却提出中國本位論來。他們向我們大聲疾呼道：「不守舊，不盲從。」正當的辦法是「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

具體些說：「中國本位」在他們說：「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

本來嚴意「中國本位」……何消說來，是含有國家主義氣味的。不僅這樣，而且含有中國主義的氣味。但是，這個解釋如把它發更過來，成為了文化的實在論和辯證論之應用，從而它的科學性也就顯現出來。中國本位論就是以切合此時此地的中國需要為建設文化的標準的主張，不事空想，注重現實性和特殊性的把握，所以在原則上，實無可非難。

記得從前布哈林在他為第三國際中人崇奉為理論家的時代，曾經在一本書上說過，社會主義在各國，將因其歷史的條件，要呈現出種種形態，我以為就是注重現實性和特殊性之所必然的。確，大同是未來的景象，不是現在的實踐。所以那篇宣言又有如次的聲明；「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是拋棄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設中國，成為一個健全的單位，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所以那篇宣言，證明了中國一般人的理論水準之比從前進步。從前的人，對於中國本位，總是予以感情的和道德的解釋，缺少科學意味。而那篇宣言，則完全立足於科學之上，在理論方面是健全得多。

所以為要明白那篇宣言的社會意義，須當從其歷史意義上去領略。所謂歷史意義，就是宣言中「一個總清算」那一部份內之所說。

在那裏，它對於中國文化近幾十年中的經過，作了一個由封建移到資本的指明。而在這個移到中似乎又給我們透露出了一個由介紹邁向建設的指明。

本來中國在『五卅』到『一九二七』的時代，有急轉直下的可能。但以政黨的關係，歷史就轉到資本方面，向另一方向領導的事失敗了。所以宣言那種分析，就顯出了它的正確性。

可是它的正確性卻透露出它的時代性。既然認定中國的政治改造在一九二七年偉大的國民革命後，「雖有種種波折，」「終於達到了相當的成功，」那末應時的文化建設，也就必然是在社會進化史上封建時代以後接着的一個階段之中了。

所以中國本位論就是一種文化的民族主義。它的社會意義在這裏是明白顯出的，用不着甚麼解釋。在封建割據和新式農民戰爭均於整個的意義中為中國傾向統一的歷史車輪所打落以後，這樣的文化建設，是有現實性的。就中國自身的發展看來，確是這樣。——能否完成，那自然要看世界第二次大戰到來的早遲及那時各種社會力量的變化以為定。

但可注意的即透露出一種活動性的，是宣言聲明不模倣英美意德等國，而主張創造；對於在資本階段的歐美文化，雖贊成吸收，却與胡適一流人不同。它說『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

然而這裏我又覺得，凡有活動性的，雖可不向那方面解釋，也可必向那方面解釋。因此我覺得還是有欠明白的地方。具體地說來，我以為今天的文化問題，是在對個人主義與非個人主義（Collectivism）決定態度。文化建設月刊意識到了這點，所以定出一個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的題目就來徵求各方面人的意見。

那篇宣言雖是主張創造，似乎對於這個問題，可以不理。但就以『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一點看來，那末對於這個問題就不能不理了。而宣言上却沒有指明這一點。

在我，覺得在吸收歐美的文化中對於個人主義是應該拋棄的。為甚麼呢？因為個人主義經過歐洲近代的實驗，已證明它不是健全的東西了。反之倒毛病百出。今天的自私自利意識，損人利己行為，不是個人主義的結果麼？歐洲已受其禍，我們不可覆轍再蹈了。

自然，那篇宣言底意思，着重之點在於原則的提出。要具體地說明中國應建設的文化為何種性質，是另一回事。所以它說了此地的中國和現代中國的需要，並沒有說此時為何時，此地為何地，需要為何種。因此，在這裏應只考察它所宣布的原則。

這個原則，依我看來，是包括在這一段話中的：

一不守舊；

一不盲從；

一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

「檢討過去，
「把握現在，
「創造將來。」

所以宣言所宣布的原則就是這三個口號：科學、批判、創造。意思就是用科學來批判既成的文化，創造未來的文化。這，當然很對。

我在近幾年所從事的文化活動，也可歸結於這三點。這是一看二十世紀便會知道的。因此我對於這三點，特別感覺興趣。我很希望發表宣言的十位先生，把這三點的意義加以發揮，造成一種思潮。

自然，我也不主張停留於原則上而不前進。所以對於我在座談會中所聞各報和有些人主張提出實際辦法的意見，當然贊成。但若以不要空論只須實幹的話來作理由，那我卻期期以為不可。

我以為在文明時代，特別是科學昌明的時代，實踐要以理論為嚮導。盲目動作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在實踐之前弄一個清楚是很必要的。理論不是別的，就是給我們弄一個清楚，它是實踐的說明。

文化建設也是一樣。因此在我，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可分為二部份；一是中國本位的說明；一是用它作方法去解決一切實際的問題。所以它是可以有理論之部和實踐之部的，那篇宣言是原則的提出，當為理論之部無疑。

並且這種提出是初次的提出。雖然科學、批評、創造不必是初次，但把它們與中國本位聯合起來成為建設文化的原則，卻是初次。所以理論的宣傳還很重要。我常覺得有許多事情，說起來人人懂，究其實是不曾人人懂的。而所謂懂也很難說呢！

此外，我還因為文化的中國本位論想起了兩件事情，打算在這裏說一說。

第一，中國大學中的講義，往往用西文原書。這固然因為中國科學很幼稚，使教授們大半都採取販賣舶來品的形式，

但爲甚麼不可以把它翻譯出來？又爲甚麼不可以多根據幾種外國書來編一本較完善的講義？而且原書裏面的例證之類，都是外國的，往往不便於中國學生的理解，若說是爲加強外國語程度，以原書作參考或注重課外的外國文讀物，不可以麼？

第二，尤爲奇異的，是許多學者著書往往用西文發表。中國學術幼稚，寫成中國文，怕引不起世界學術界的注意，用西文固然可以；然而用你們的著作來提高中國學術研究的程度，不應該麼？學者從事高深研究，在中國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把所處社會的文化水準提高，亦學者的責任。這，我覺得也是一個應該提出的問題。

以上便是我讀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後的感想。自然，因爲時間不充分，沒有細細地抽繹；但在原則上，大致這樣。

我在這幾年研究的是哲學。所以上面的話，也是一些空論。並且是簡單的概念。實際方面，我却沒有提到甚麼。與趣不掃，所知有限。這是一件很抱歉的事情。以後如有機會，再討論吧。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文化建設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李麥麥

出版界教育界名士何炳松陶希聖等最近發表了一個中國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的編者，要我對這個宣言作一個批評發表在文化建設上。他給我的信說：「請勿徇情，贊成與反對，絲毫無所顧忌。」我想發起宣言的諸位既是這樣熱心於目前思想文化的討論，對這個課題，雖無高深研究的我，當然也願意發表一點意見。

我常是這樣的想：中國在最近三十年來一切社會運動都只是重復歷史經驗，却沒有加以利用。辛亥革命前，當時革

命的領導人沒有在國民之中作廣大的徹底的思想文化運動，是重複了戊戌變法的錯誤歷史經驗。二七年革命失敗後，革命者不注意思想文化運動而只知軍事投機運動，又是重複辛亥革命後在野派的錯誤的歷史經驗。

現在總算是政治運動的一個轉捩點。思想文化運動必然會成爲今後社會運動主要課題之一。從這一點看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之出現，與時代轉變不無關係吧。

可是，假如說「宣言」之出現是與時代有關的，但「宣言」本身卻未能盡量體會牠的時代。因此，「宣言」只可以作爲今後思想文化運動的第一炮。如果我對這個「宣言」有所批評，我的批評便落在「宣言」的基本精神之「二律相背」這一點上。由於「宣言」的基本精神之「二律相背，」遂大減「宣言」的意義。

「宣言」一開首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對面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蟄伏的嚴寒中；沒有光，也沒有熱。」

這種指示很正確的。中國本來是一個幾千年的文明古國。但到現在，這古國的文明不但不能去驕視文化的新進國，反而被一般新進國的物質文化壓得出氣不得。這原因在甚麼地方呢？在於下面，

「爲着尋覓光與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有的拚命鑽進古人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但骷髏是把他們從黑暗的邊緣帶到黑暗的深淵，從蕭瑟的晚秋導入凜烈的寒冬。」

讀上面的一段話的人，不能只視爲秀雅的美麗的辭藻而了事的，應當知道這段話是近百年來的中國民族不能變爲近代民族的結實原因。這種指示，使我對「宣言」寄以最大的同情。

「宣言」又說。『漢代以後，中國文化就停頓了。……直到鴉片戰爭，……巨艦大炮帶來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帶來了威脅中國步入新時代的警告，於是古老文化起了動搖，我們從因襲的睡夢中醒覺了，』

醒覺以後的中國曾發生了四次大的文化運動：便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康有爲梁啟超的「維新」運

動，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和「五四文化運動。」

「宣言」對這前三次運動的評價是：「洋務運動，」「完全是技術的模仿。」「維新運動，」「不過是政治的抄襲。」這都可以說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見解，……畢竟是皮毛的和改良的。」惟有「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主張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作徹底的改造。」

總上所述，可以說都是很正確的。惜乎「宣言」沒有根據這種正確的精神一貫地發揮下去，遂不免減少了「宣言」的意義。「宣言」的根本精神（或思想）之「二律相背」表現，不僅容易使人相信「宣言」的本意是在保存東方文化，而且使「宣言」自己反對了自己。

「宣言」的標題叫做「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這「中國本位」四字，就容易使人聯想「中學爲體」的思想上去。「本位」作何解釋？單純作「中國需要」解釋麼？那就無批評之可言。因爲誰會出來反對中國文化建設應合乎中國需要呢？但是「中國本位」四字，除了作合乎中國需要解釋外，牠還有第二種絕然不同的解釋。這就是中國文化爲「本」和「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特徵」的解釋。也就是我所謂宣言的「基本」精神「二律相背」的地方。

按「宣言」的第一種精神，結論應該是而且已經是：「中國應『迎頭趕上去』……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作徹底的改造。」就是說，中國文化應當歐化近代化。按「宣言」的後一種精神，結論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這就是說中國應保留東方文化然則中國文化運動究應歐化近代化呢？抑應保留其東方文化特色呢？

在我看來，「宣言」的主意如果「主張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作徹底改造，」那麼，那種中國爲「本」和「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的思想，不但不應該，亦且不可能。

爲甚麼？因爲一定的文化形態不僅是基於一定的社會基礎，而且要與一定的社會基礎相適合。古希臘羅馬的奴隸所有者文化形態之不適合於中世紀封建社會；恰同中世紀封建文化形態之不適合於近代資產者社會一樣。當近代資

產者社會在其封建母體內開始孕育時它的將有的文化形態亦同時發生。近代資產者社會的文化形態雖成熟於十九世紀的中期，但資產者的文化運動從十五世紀就已經開始了。這樣看來，如果我們要「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作徹底的改造」我們又怎能「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呢？

中國的文化果然值得我們作為「特徵」麼？

我們要使中國的政治具有中國的特徵麼？作為中國「特徵」的政治上有兩種：封建和專制。封建政治已成為中國民族的桎梏。專制政治之名雖廢於辛亥革命但專制政治之實至今仍危害中國。這類政治還值得作為今後政治特徵麼？

我們要使中國的社會具有中國的「特徵」麼？不用我們勞心，五十年來的思想文化運動並沒有把中國社會改變多少。走到內地各省一看，除經濟衰敗和破產以外，一切都是古香古色的保持着中國社會的「特徵」：簡陋的手工業、落後的農業、男女不平等、多妻制、奴婢、辮髮、束胸、纏足，這一切都是中國社會特徵之特徵，今後的中國社會還要保存這類特徵麼？

思想的「特徵」麼？奴隸、屈從、迷信、安命、保守、說好的，、忠、孝、貞操、守寡，都是中國的思想的「特徵。」這些特徵因不適近代生活早已被有革命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掃到廁所去了，我們現在還用得着把這些掃了的東西撿起來作為中國的「特徵」麼？若然，現在的文化運動不是「五四」文化運動的否定麼？不是回到「皮毛的和改良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時代去了麼？

「宣言」說：「日本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强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强烈彩色，那裏還成為日本畫」我們在文化建設上，也需要有這樣的認識。」

日本畫家之言，用在藝術上，也許有幾分理由，至於說「我們在文化建設上，也需要有這樣的認識，」那就大錯特錯。試問：日本之所以有今日之日本，是在日本人能如畫家之所言保存日本文化，抑在日本能徹底模仿西洋文化呢？我敢說，

是在日本能徹底的模仿西洋文化。

我不否認中國過去數千年的文化遺產中有應保存和應發揚的文化遺物，但這要在我們的文化已經歐化近代化之後纔有可能，這猶之數千年來的中醫雖保有一部分醫藥的經驗，但要發揚這一部分醫藥經驗卻非待中國的新醫學發達之後不可。不這樣，而強使現在的文化建設「具有中國的特徵」，一定會阻止中國走向近代文明之路。

「宣言」第二節說：「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媾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入工業時代的歐美，自有其不同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完全模仿英美」。又說：「除卻主張模仿英美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但其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的空間時間的特殊性」。

這種意見，初看來，彷彿非常正確，但在實際上，它是錯誤。爲甚麼？因爲它否定了中國現階段的文化運動之歐化近代化任務。問題的提出，不應是「完全」模仿英美或模仿蘇俄或模仿意德；問題的提出應該是現在的中國文化運動還是應西洋化近代化抑是應保留東方的特徵。假如說，「巨艦大炮帶來的西方文化消息」「威脅中國」非「一步入新時代」不可，又假如說，處在農業和工業「交媾」時期的中國非完全蛻化爲工業社會不可，那麼，中國文化運動之歐化和近代化目的是應明白提出的，而中國文化運動之反東方化任務亦應同時提出。

從中國文化建設之何去何從問題，使我想起文化後進國的俄羅斯也有過這種討論。俄國彼得大帝是首先嘗試在俄國與西歐之間的海上築架橋樑的人，自此以後，俄國還是西歐化還是保留東方色彩，這個問題幾乎支配了整個的十八十九兩世紀。俄國「斯拉夫派」要把他們封建的東方文化當作本國的特徵加以保存和發揮。反之，俄國的進步思想家自赫爾岑（Alexdern Herzen）以來便和彼得大帝的努力一樣想使俄帝國變爲一個近代文明國。俄國十九世紀以來的社會的發展和現有的發展，不僅完全使俄國西歐化，並且還要去趕過西歐的文化。就這一點說，列寧不過是彼得大帝留給俄國的政治的嘗試之直接的執行者。有人說，列寧曾直接的反對彼得堡城名之任何修改，即是表示列寧對

彼得大帝致無限的景仰。這樣看來，十月革命之世界意義，雖是表示人類新歷史之開端，但就十月革命對舊俄國遺留下來的文化任務說，牠不過是過去歷史之持續和頂替！歷史的車輪已把俄國的「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意見化爲歷史的諷刺畫，我們現在是否還用得着製造這種諷刺畫呢？

人類雖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人類並沒有選擇歷史環境的自由。人類只能在歷史的必然前提下加以努力。我們固不能說歷史上天才的權威是傀儡喜劇，但是違背歷史的努力就不免變爲滑稽。

這就是我對「宣言」想在中國文化建設上保存中國文化特徵的批評。

最後，我熱烈地希望今後思想運動能超過「五四」，能比「五四」有更大的收穫。

一九三五、一、十八日

文化建設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從五四運動說到一十宣言

許性初

一 我們此時是否需要所謂「一十宣言」

在此內憂外患，民生憔悴之時，當務之急應該是不尙空談，埋頭苦幹，從事解除憂患復蘇民生的實際工作，舞文弄墨，研究講說，似乎是不需要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人類的生活是一種集團的生活，人類的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大家的問題，因之人類要解決個人的生活問題，亦不是祇憑個人一己的力量，僅由個人本身上着想可以有爲，必須用集團的力量，從大衆的身上着想，然後可以生效。於是我們可以說：一個乞丐的問題不能從乞丐的本身來解決，而應當從國民經濟上來解決；一個漢奸的問題不能從漢奸本身來解決，而應當從國家民族上來解決；一個娼妓問題亦不能僅從娼妓本身來解決，而應當從整個社會制度上來解決。總之，自從人類的生活成爲一種集團生活以後，無論任何問題都是大家的問題，要解決任何問題都須大家感覺了問題，認識了方針，羣策羣力，共同奮鬬，然後可以達到目的，而要使大家感覺問題，

認識方針，則必須先使大家的意識上有一個共同覺醒；所謂文化運動提醒人類意識，集中統一人類意識之工作。所以在中國今日內憂外患民生憔悴之時，雖然當務之急是應當不尙空談，埋頭苦幹，從事解除憂患，復蘇民生的實際工作；但是若不能先把全國國民的意識提醒，使國民意識共趨於一途，使國民精神同向一條路上發展，則雖有一二埋頭苦幹者，於整個國家民族亦何能有大補，——況且所謂埋頭苦幹者是否是爲國家民族還是問題。因此我們以爲中國今日要想解除憂患，復蘇民生是要大家一齊起來，埋頭苦幹；是要大家在一條路線上面共同奮鬬，埋頭苦幹的精神固要緊，而提醒國民意識，集中國民意識的文化運動尤爲重要。因此，我們對於十敎授『一十宣言』中所提出的簡單扼要的『中國本位』四個字，不應當以一個普通名詞來看，亦不應當以文學家的一個美麗詞藻來看，更不應當以一般流行的空洞口號來看；我們應當看爲是國民睡夢中的一聲警鐘，乘生迷路時的一個指針，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際的一條出路，它有光芒，它有力量，它可以使人民的意識覺醒，它可以使人的意識集中，它可以使人民於『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中把握住一個簡捷扼要的戰鬬方案！『一十宣言』的影響已經遍及全國，『一十宣言』的結果，吾人且拭目望之，『一十宣言』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値亦惟有留諸將來歷史家去評斷而已！

二　五四運動的批判精神與一十宣言的批判態度

一個理論的產生必須經過『破』與『立』的兩層功夫，一個文化運動的形成亦必須具有『批判』與『建設』的兩種精神。蓋不經批判，不足以發現舊文化之缺點，不謀建設，新的文化亦絕不會有系統的表現。但因時代的關係，有時文化運動側重批判方面的活動，有時則側重建設方面的努力，批判正所以爲建設，建設仍不能缺少批判，所以我們不要把批判看爲完全破壞，亦不要把建設看爲是盲目堆砌，『破』與『立』永遠是在一種工作中相伴而行的。知乎此，我們便可以看出五四運動與『一十宣言』之相同與相異矣。五四運動的思想表現是充滿了批判的精神，而『一十宣言』的思想表現亦處處注重批判的態度，此爲五四運動與『一十宣言』之相同點。五四運動之批判精神是側重破的方面，

而「一十宣言」之批判精神則偏重立的方面，此爲啟蒙運動與「一十宣言」之相異點，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亦是文化運動的自然方式。黑格兒的辯證宣言：一切發展都是經「正反合」的三步歷程，我們若把中國的固有文化作爲「正，」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看爲「反，」則今日十教授的「一十宣言，」就是「合。」近代唯物辯證法家說：一切發展都是由「否定的否定」法則而行，我們若把中國的固有文化看爲肯定，則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便是否定，而今日十教授的「一十宣言」即是「否定的否定。」蓋數千年來的傳統文化，若不經過五四運動的嚴厲批判，絕不能打破他人支配權威，但破壞以後若終久沒有新的文化系統建立，人民徘徊歧路，無所依歸，勢將更感痛苦。所以十六年前先有以「破」爲根本態度的五四運動，至今日又有以「立」爲根本態度的「一十宣言，」由批判而到批判批判，批判之方法前後相同，而所以批判的態度則彼此各異也。因此，五四時代陳獨秀說：「[illegible]」欲建設新國家，新社會，則對於此新國家新社會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十教授的「一十宣言」則說：「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一樣無用；必須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在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我們的文化建設就應是：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判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十教授的「一十宣言，」我們看來正如黑格兒所講的「奧伏赫變」（Aufheben），他們完全是本着社會科學方法中的「捨取法」而產生的。（註）十教授固然都是對於社會科學有研究的人，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有此態度，還不是完全由於十個人聰明才知，而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質言之，即沒有五四運動的歷史，絕不會有「一十宣言」的要求，因爲「人類提出的問題，常限於他自己所能解決的問題，一個問題必須等到解決這個問題所必要的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也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

（註）Aufheben 日人譯爲「揚棄」「止揚，」張東蓀教授譯爲「消留，」此處我暫試譯爲「捨取，」以後當詳

論。

三　十教授給了我們些甚麼東西

自從十教授的文化宣言發表以來，『一十宣言』已經成爲到處傳誦的東西，『中國本位』已經成爲人人討論的問題，在此學術界，輿論界，以至社會人士全體注目這一個新運動之時，反對議論者當然亦大有人在。贊成者不必說，根本反對者自有十教授來答覆。我亦不管；我在此所欲提出的一種意見，即社會確有一部分人原則上絕對贊成十教授的宣言，而於內容上則嫌其空洞，沒有給大家指出具體辦法。我個人起初讀了『一十宣言』，亦有此感，後來一想，覺着十教授不先提出具體而僅拿出『中國本位』四字作爲文化建設的態度與方法，這個態度的提出就是給我們的極大禮物，這種方法的指示，就是給我們的極大教訓。因爲歷史上的一切運動——尤其是文化運動，凡能影響成風者，都不過是一種態度之提出與方法之指示而已。決定了態度，認識了方法，具體工作自可一步一步地表現出來。若預先即把具體事情一一列舉出來，不能舉之不勝其舉；即使勉强舉出，而亦無法使多數人共同實行；而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還不免要起許多爭論。易經說：『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一種運動之提出必須不背『易簡』二字之道理，然後可以造成風氣，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中不提出具體辦法而僅僅的先喊出『中國本位』四字，其亦欲使人『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我們看近代的幾種運動，如『男女平等』運動、『思想解放』運動、『社會改革』運動、『不合作』運動，乃至如『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在起初提出時何嘗不是僅有一個態度的表示與方法的指出呢？待人人意識都覺醒之後，具體事情乃隨運動之發展而逐漸演出，具體事情演出愈多，一種運動的意義乃更加明顯。所以我敢說，『中國本位』四字即一十宣言之莫大貢獻，而十教授在一十宣言中所欲貢獻於國人者恐亦惟有此點。曾記得大哲學家康德對他的弟子說：『我沒有教你們甚麼哲學，亦沒有教你們甚麼歷史，我祇給了你們一個研究哲學與歷史的方法。』而哈林解釋唯物史觀亦說：『唯物史觀並沒有給我們甚麼具體方案，它祇是

給了我們一個觀察社會與改革社會的方法。』（註）我現在亦說：十教授的「十宣言亦祇是給我們提出一個今日中國文化建設的態度與方法。這個態度與方法卻足以使我們深加玩索探討矣！我們不應當以內容空洞來責難他們。——當然我們還十分希望他們以後更有具體的辦法！

（註）所引康德布哈林語一時手邊無書僅錄大意未能照引原文然亦無大出入

文化建設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談『中國本位』

潘光旦

一月十日，有十位教育界與出版界的領袖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月二十一日，他們又召集了一次『文化建設座談會』，據說這是第一次，以後還要陸續舉行。我們對於這個宣言大體上很贊同，對於座談會的公開討論方法，也認為很有價值，不妨多多的舉行。一個民族，好比一個個人，不能沒有它的所由『立身』的道理；一個個人不妨作相當的孤高自賞，卻不能完全遺世獨立，和別的人老死不相往來；一個個人應當和社會其他部分發生種種相互的關係，却也不宜像一滴水掉在海裏一般，完全與環境混化；——一個民族也復如此。所以所謂『中國本位』的理論，在原則上是誰都不會不贊成的。不過『本位』二字究竟有甚麼意義，它的內容究竟包含些甚麼，倒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建設宣言裏固然已經加以解釋，但似乎祇說得六七成，並且連這六七成也沒有說得很清楚。

何以見得沒有說清楚呢？第一次的座談會便是證據。座談會席上的議論原是根據了宣言的內容而來的，照理應該有相當可供尋繹的總線索，但事實並不如此。例如劉湛恩先生一面看到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一面卻也提出『基督教本位』的意見；歐元懷先生提出的是『科學化、標準化、普通化』的『三化原則』；俞寰澄先生主張以農村為本位；黎照寰先生也申說『科學化』的重要；葉青先生則主現代化；黃任之先生很看重中國舊有文化因素的分析與選擇；李浩然先

生注意的是城鄉的平衡發展；陶百川、何西亞、劉愈三先生都主張以三民主義為最高的原則；邵爽秋先生又以為應特別注重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吳子敬先生特別提出紀律化與腳踏實地的兩點；李麥麥先生說：「我們應接受歐化，應肯定的宣示資本主義的文化；」……這第一次座談會的結果，似乎教我們對於「本位」二字的意義，越看越糊塗起來。許多發言人中間，有的就壓根兒沒有顧到它；有的把它和原則，標準等事物看為一談；有的似乎於中國的大本位之外，又提出了一些小本位來；有的並且發為和「本位」觀念根本上相衝突的議論。我們不禁要問，目前文化界的領袖對於「中國本位」的見解，既若是其紛紜歧異，前途的文化建設工作又怎樣着手呢？我們唯一的慰安是：座談會多舉行幾次以後，大家集思廣益的結果，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共通的見地。

在這共通的見地沒有得到以前，我們不妨參加一些意見。可以分兩部分來說。一是「中國本位」一名詞的意義，二是它的內容或方面。

「本位」二字原是不難了解的。物有本末事有先後，明白得這一點，古人稱為「近道」。以中國為本位是以中國的治安與發展為先務。本末也有主客的意思，所以本位就等於主體，也有輕重的意思，所以本位所在就等於重心所寄。也有中心與邊緣的意思，所以以中國為本位就無異以中國為中心，譯成英文，是 Sino-centric。「中國」的稱號原有這個意思，但同時也養成了一種妄自誇大的心理。今而後此種自大的心理應去，而自恃自愛自尊的態度卻不能不培植。本末也有常變的意思。中國是一個常數 Constant，世界文化潮流的動盪終究是一些變數 Variables。我們決不能因變數的繁多，而忘卻了常數的存在。我們更應該以變的遷就常的；常的對於變的事物，雖宜乎不斷的選擇、吸收，以自求位育，但也不宜超越相當程度，使外界對於它的個性發生懷疑、錯認、甚至於根本不認識的危險。本末也有體用的意思。以前提倡「洋務」時代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兩句話，也不能說是全無道理。

至於「本位」的內容或方面，也可以比較具體的說一說，這其間實有三個方面或三個因素。一是我們個別的地理

與物質環境，二是我們個別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組織；三是我們的也是比較個別的民族性格。其要講中國本位，這三者便全都得認識。中國的地理與物質環境自有它的特殊之點，不能和別國的完全相提並論；以前大家總以為我們地大物博，可以舉辦任何事業，創造任何格式的文化，但近年來地質學家再三告訴我們說，中國地雖大而物不博，農業經濟家又說，就可耕的面積而論，並且連地都並不很大——這便是一些關於第一種因素的本位上的認識。中國的歷史文化更有它的特殊之點，更不便和任何別的國家混為一談。在以前講社會與文化改革的人，動輒主張把舊的全盤推翻，把新的從根再造，真好像創造文化是和造屋一般的簡單容易；但近年以來，這種主張已不大聽見，大家已經逐漸明白一個民族的經驗，好比一個個人的閱歷與記憶，要完全不認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相宜的。這就是關於第二種因素的一些本位上的認識。記得梁任公先生曾經說過一句比較自負的話，他說我們鬧了好多年的維新運動，則無成績，總算把科舉推翻了。我們今日看來，這便是一句不大認識歷史與文化本位的話。後來美國孟祿博士在他的中國——一個演化中的國家一書裏，認為科舉取消得太快，弄得新舊教育制度與人才所由產生的機括青黃不能啣接，實在是一件遺憾。孟祿博士這種見地足徵他雖然是一個外國人，但是對於「中國本位」卻很有一些認識。說也奇怪，就我們平日聽見與讀到的議論而言，這種「中國本位」的認識，倒往往是外國人表見得充分；大約是隔江觀火，特別來得清楚罷。例子很多，最近也是最有力的一個便是國際教育調查團的報告。在本國思想界裏，近來很不可多得的一例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民族自救的最後覺悟一書裏所發表的議論。

至於本位的第三個因素——民族性格，講來談的人自然是更少。在這方面不斷的作一些寒蟬之鳴的，恐怕祇有本刊了。但民族性格這樣東西，無論我們把它當作一種後天的習慣看或先天的遺傳性看，終究是很實在的，並且它的個別性的顯著，也不在地理與歷史兩個因素之下。依我們的愚見，我們並且相信這種民族性不能全沒有先天的根據，這種根據一部分可以推溯到民族所由組合而成的各個種族的原先有的特質，一部分乃是歷史期內自然淘汰與文化選擇的

產業。這一方面的話我們以前已經說過不少，現在不贅。沈有乾先生在最近期的教育雜誌裏發表了一篇中國民族性的一斑，報告他試用美國朋路透氏品性測驗法的結果；他所得的結論也許一時還不能認為定論，但也不能說與事實完全不切。只要與事實有五六成以上的符合，那就不容我們不注意。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無論是為好為歹我們總不能不明白承認民族性格是本位中的一大因素。

我們在上文說文化建設宣言裏對於本位二字的解釋，似乎只說得六七成，並且連這六七成也沒有說得很明白，現在我們可以更具體的說幾句了。宣言在第三節『我們怎麼辦』下面，承認中國地域的特殊性和現在的時代性，主張不復古，不盲從——這些都表示發宣言的人對於上文所提的第一第二兩因素已經有了一部分的認識。但是對於第三個我們認為是更根本的因素，便壓根兒沒有提過隻字。他們說『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又說吸收歐美文化的標準，是根據『現代中國的需要』。不錯，我們有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但需要是一事，滿足此種需要的條件與能力又是一事；條件應求諸我們的個別的地理環境與文化背景，能力應求諸於我們的民族性格。我們要科學，我們要組織，我們要工業化……那一件近代國家所由強大的法寶我們不要？但我們的條件能力究竟能否滿足和滿足到若何程度，大家卻沒有問。不問能力與條件而談需要，結果等於不談；不問能力與條件而言文化建設，即使有些微成就，也決不是『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華年周刊四卷三期

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討論

江問漁

本年一月十日，有十位教育界負聲望的先生，發表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分三段：第一段痛論中國在文化領域內已經失去了地位，很憤慨的說：『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變了沒

有中國人』因此主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纔能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纔能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並指示出努力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方法，要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第二段，把從前中國文化的歷史陳跡，與近數年來文化運動的主張言論做一個清算。第三段，乃說到十位的主張，指示出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性，不一定同於他國，中國有現在的時代性，不一定同於古代，所以要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對於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不必徒然贊美，也不必徒然詛咒，應該加以檢討，決其去留。對於歐美文化，應該吸收而不應該全盤承受，「要決定於現代的需要。」而總申其義曰「不守舊，不盲從。」在此思想紛亂陰霾蔽空之際，有此一個霹靂，發現於教育文化界，不但促起一般人的特別注意，簡直可以說是中國最近思想界，最有價值的主張。依我個人說，當然是十分贊同的。

經過了十日，十位發表宣言的先生，爲集思廣益計，復有召集『文化建設座談會』之舉，我也是被邀者之一，可惜因通知信上的地址寫得稍有錯誤，事過三日，方纔轉到，而到會諸位先生的言論，在報紙上早已經完全發表，並且我已經一一讀過了。

今日看到本月廿六日出版的華年，有潘光旦先生做的「談中國本位」文一篇。他的意見，對於宣言的原則，表示贊同，但以爲對於「中國本位」的解釋，尚未能充分說得清楚。同時他對第一次座談會的諸位言論，認爲未能撮住問題中心，希望以後經過數次，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共通的見地。說到「中國本位」哩，潘先生認爲「民族性格」一層，關係也很重要。他說本位的因素共有三個，就是除去宣言中所說『中國地域的特殊性和現在的時代性』外，還有中國『民族性格』的存在。因而說：『不錯，我們有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但需要是一事，滿足此種需要的條件，與能力又是一事，條件應求諸我們個別的地理環境與文化背境，能力應求諸我們的民族性格。』他以爲宣言裏面和第一次座談會諸位先生議論裏面，尚未能將民族性格一層顧到。我覺得潘先生所說的這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中國民族的性格，究竟是怎麼樣子，的確要好好的研究，把他認識清楚。如果經過分析認明以後，他是好的，便應該選擇他，發揚他；他是不好的，便應該遏抑他，淘汰他；他是可好可壞中性的，便應該引導他向好的一方面去。這一層研究分析認識決定的工夫，決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做的，一定要集合多數人的聰明才力，纔可以得到相當的成績。第一層工夫做好了，接着第二層，就要做如何選擇，發揚，如何遏抑，淘汰，如何引導的工夫了。釐訂政法制度啦，改善經濟組織啦，酌定教育政策啦，自不能不看準中國此時此地此人的需要條件和能力如何。好的醫生診病，用藥，一定要先問明白，病人是生長在什麼地方，南方呢，還是北方呢？從前的身體怎樣？强的呢，還是弱的呢？有過什麼病沒有？一向是操何職業？靜的一類呢，還是動的一類呢？問清楚認明白之後，才可以定用藥的分量，和施治的程序。大同小比，我們要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應如何着眼着手，也就可以明瞭了。所以我說，潘先生所說「民族性格」一層，是很值得注意的。 國訊旬刊第八十六期

中國本位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與實質

漆琪生

在眼前的世界範疇內一切問題曾沒有中國形影的局勢之中，在中國文化領域內宗派紛歧異常混亂而使中國文化實質日臻低落的局勢之中，突然有十教授的一十宣言，要想從世界文化領域裏表露出中國特有的面目，使中國各自具有其本位的文化，像這樣的運動。絕不是偶然的事象，而是具有歷史成果的必然的意義。

誰都知道，一切社會運動之興起與衰滅，都是該當於社會的經濟發展之歷史的成果，所以在某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內，必發生特定的某種社會運動。文化運動之興起亦是這樣。例如近世紀中國之文化運動，由清末以來的民族革命文化運動，以及由五四以來的反封建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與由五卅以來的反帝反資本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無一不是在這個關係上發生出來的，而且還都是各自依其歷史行程的規定而表示着種種特定的姿態。

時至今日，基於中國國運的殖民地化危機之日益迫切，中國國民經濟機構諸體制之日趨解體，經濟發展之日趨畸

於是從近來的中國文化亦日加混亂而凌夷。五四運動以還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終因中國國民經濟之健全的資本主義化絕對無望，經濟發展只能局限於殖民地化的買辦經濟之畸形方向，於是遂使歐美列強的資本主義文化之建設亦不可能，而只能輸入其皮毛殘渣，形成中國現成的洋涇浜式的奴才文化。五卅運動而後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亦因世界的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機運之未充分成熟，生澀僵硬的機械主義的社會革命運動徒益騷亂而失敗，致使社會主義文化運動近年在中國文化領域內亦無何等建設功績，而只是出現一時社會科學文獻廣搜的翻譯與幼稚的介紹之狂潮。像這樣的淺薄的醉心洋化之新文化運動，必然的是既不能將外來的各種文化完全移殖於中國，掃除中國既成的舊物而使中國文化成為嶄新的姿態，但又不能使中外文化互相溶合，而成為別個的新的溶化體，新不是新，舊不是舊，健全的資本主義文化既不得產生，成熟的社會主義文化又無從實現，新文化運動大都失敗，文化領域的混亂局勢遂益趨劇烈。

輸入外國文物的各種新文化運動無成績的結果，自然促進了年來的整理國故的復古運動之抬頭。久為國人所棄捨的封建古裝，現在又被許多痛心歐化提倡國粹的人們穿帶起來，而且這種尚古崇舊的傾向，大有與日俱增之概。不過，這種以中國既成的前資本主義農業經濟為礎石的復古運動，雖有現今的國粹先生們為之竭力倡導，然而業已朽腐頹潰的中國農業經濟，無論如何皆無充分的實力與養分，使在現今的二十世紀之歷史行程中重新開放澳麗豔世的美麗之花，相反的，這個運動，在資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前，乃羸弱無力，將必為其所摧踏夷沒。

這樣一來，在眼前中國文化領域中，新舊交錯，互相排擠，而彼此皆不能健全的充分的發展，使今後中國文化獲得向上增進之機運。封建文化之復興固不可能，資本主義文化之發展亦屬無望，而社會主義文化之成熟更為遼遠，無一適當的可循之道，徘徊彷徨，成為中國文化當前最苦悶的問題。

中國文化往何處去？

凡是對於中國一切問題，特別是對於文化問題，不抱悲觀主義與宿命論的人們，皆是積極的想對於問題求得一個適當的解答。

在中國現階段的歷史運命之下，如像過去的一味醉心迷戀外來的文化，不顧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特殊關係而生硬的强加輸入，固是失敗而無益，但是如像一般頑固强項的閉戶自大，不顧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務舊不新，亦是枉然而不必。中國雖是世界的一環，然而中國始終是中國，中國自有其特殊性，中國過去的一切雖已陳腐潰敗無補於未來的新中國之建設，可是基準中國的特殊關係而將各種新的要素選擇採納，使之溶化於此特殊的中國經濟社會機構之內，成爲有效而適當的新的動力，這確是異常必要。中國一切運動的有效發展的可能條件，即如中國文化運動的有效發展的可能條件，只有如此。而這種可能條件迅速實現之要求與期待，現已成爲中國民衆普遍的意志；同時歷史車輪亦是輪迴到了這個階段。洋化不通，守舊不能的所謂有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不甘衰殺而想振作圖存，必然的是只有另求新的道路。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意義之下，所以此次十教授的一十宣言，終於完成了他的騎士的偉業。

中國須有中國本位的文化！中國人必須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現在中國正在需要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這一連的話，是人人贊同，無人反對的。但是，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云者，畢竟是什麽意義；這卻值得討論，或將人異其言能。

何謂中國本位的文化？我對於中國本位的文化的解釋，以爲本位云者，絕對不是一般的專門固守中國舊有文化之意義，所以中國本位的文化運動，也絕對不是一般的保守國粹的復古運動。中國本位的文化之眞義，應該是指該種文化，第一，必須以適應於中國經濟社會現時之需要爲本位；第二，必須以有利於中國經濟社會當前之發展爲本位；第三，必須以適合於中國經濟社會之特殊條件爲本位；具此三端，始足以云本位。在如斯的本位原則之下，凡不合於此原則者，雖中國歷代相傳的舊文化，亦必毅然廢棄，雖外國最新的摩登文化，亦無須迎頭趕上。必須如此，眼前混亂迷蒙的中國文化領域，始有清明而提高之一日，文化運動的實踐的機能始能達到。

然則怎樣的文化纔是對於中國經濟社會適合需要而有利的呢?很明顯的,在現今中國前資本主義之農業經濟社會中,當前最切要的是障礙農業發展的前資本主義因子之揚棄,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領導權之把握,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準備;可是同時在此小農經濟絕對優勢的農業經濟社會中,比較和緩而逐漸變革的經濟改造之方式,較與現實的經濟發展之條件相適合;因此,凡屬能夠完成上述二大任務之文化,皆爲現階段的中國經濟社會所需要,皆與中國經濟社會相適合,而皆於中國經濟社會之發展有利。正因是這樣,中國本位的意義,始得實現而始可稱爲中國本位的文化。

可是,上述任務的實現與完成,是具有壯烈的鬬爭的革命意義,因之未來的眞實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又是具有革命的鬬爭的與創造的要素,而不是單純的模仿與翻譯,同時也不是妥協與奴化,再不是安命與樂天,更不是頹唐與幽默等傾向。這些傾向皆不是中國文化當前的要求,而必須徹底清算和否定。中國本位的文化運動之基本任務,即在於此。

然則,中國本位的文化運動畢竟以何處爲歸宿呢?這個問題的解答,我要極簡單的答覆,乃是準備於未來的偉大的歷史之滙流。是以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運動,不過只是現階段的中國革命行程中之一過渡的現象,是一般對左失望對右亦失望的中層知識份子之騎士的運動。

文化建設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一十宣言之檢討

姚寶賢

文化(Culture)是把自然的事實,依據一定的標準所支配與形成;爲實現其理想而有多種過程之表露。同時,文化的價值不是附繫在少數人之好惡,是賦有論理的普遍妥當性及先驗之價值。所以文化是知識發達的意義,並是物心兩方面之發展。進言之,文化是演進的變化的,把握着時間性,及空間性的。

歸入本題,所謂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固有之文化,誰都知道在周秦時代已臻黃金期沸點,但經不住外來文化印度

阿黎耶民族富有理智的印度文化之輸進，而宣告了「破產」！繼起者雖有打着孔孟之招牌，充其量是附屬在皇家的少數人之嗜好，而把我們民族先驗之價值早已抹煞了。所謂中國文化之演進，是「居士佛教」「和尚拜孔」——和尚與三家村的學究一部鬬爭史而已。中國文化之進蹟是什麼？當然孔佛二分天下，並有道教做着配角。中國本位的文化是什麼？不錯的，是有冠冕堂皇成績之可言，不過不幸短命死矣——在周秦時代已宣佈了「壽終正寢」。所以剩餘的價值：儒釋道各行其是，有看破人我執的屈事數君而不恥的馮道，並有忠心赤胆的岳飛文天祥等等之事實。一面有禁中仕祿的隱士，一面有「一採菊東籬下」的隱君子者流，我們試仔細的回顧中國本位文化是什麼？不管看萬花筒一般愈看愈眼花了。有些人以爲儒教的忠孝節義……是我們固有文化之精華。其實，還稱倫理問題，古代的希臘羅馬，何嘗「當仁而讓」呢？不過，他們是講在明處，然而中國，在孔子的鐵蹄下，不知踐踏了許多的爲名節而死的冤鬼。其實，還責任不盡孔子負起。是那些因爲與和尚鬬氣不過的自己捏造的「假法實」而作的孽！

老實說：任何的狂大的民族，絕對不敢在文化的前提下，指出一個「本位」來，當知設印度阿黎耶民族渡過印度河向東侵略，征服那黑色的野蠻民族，而造成傳延迄今的印度文明。同時阿黎耶民族又向西漸而啟波斯文明。究竟印度文明的本位問題是什麼？是東方的本位抑爲西方之本位？恐怕「釋迦再世」也答不出一個究竟來。要知道，文化固具有時間性並具有空間性的。今日從考古學人種學上來研究，那東西文化兩大圈套中何分不出誰爲誰之本位，何況滄海一粟的中國文化？你說中國有偉大的孔子，不知西方也有過爾遼廣大的拍拉圖。你說孔子有天下大同之思想，但是拍拉圖也有其「理想國」。你說中世紀有復興儒教的朱熹，但是歐洲也產生過發明「三大判斷」的康德。

還有中國雖是悠久，但其間曾受外來民族統治了幾次。民族的氣質無形中改變了些許；那麼文化的內容也隨着要轉變了許多。所謂真正的漢民族本位之文化之檢討，殊有「海底撈針」之難。

所以中國「本位」的文化之確定，殊非易事啊！

二月十三日晨釋晨曦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商榷

車同文

（一）

本年一月十日陶希聖等十教授發表了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對於中國文化的建設，提出了許多的意見；在那個宣言當中他劈頭就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對面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蟄伏的嚴寒中，沒有光，也沒有熱；爲着尋覓光與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有的壓拼命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有的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脚，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衆生的繩，把他們吊上光明溫暖的天堂；但骷髏是把他們從黑暗的邊緣帶到黑暗的深淵，從蕭瑟的晚秋導入凛冽的寒冬，傳教師是把他們懸在半空中，使他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虛無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結果是同一的失望。」

這意見就是說：今後中國文化的建設，不但不能守舊，且亦不應盲從，如果是偏於守舊或是偏於盲從，都是中國文化建設的障礙，接着他又說：「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牠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

其實，我們儘可以說中國文化的落後，儘可以說中國思想界的貧乏，然而要肯定的說現代世界裏面沒有了中國，中國領土裏面幾乎沒有中國人，這好像是犯了矯枉過甚的毛病。先就政治形態來說，中國國民黨的統治與三民主義的「訓政」，這難道不是特徵嗎？至於社會組織與思想的內容，雖是紛然淆亂，駁雜不純，有封建殭屍的活躍，也有資本主義的舞蹈，但是此種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畸形現象，正是具體的說明了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特質。固然，這些現象的合理與否，還是一個問題；然而要完全否定中國的存在，這未免有沾了忽視現實的嫌疑。總結來說現代世界裏面何嘗是沒有

中國，不過現在的中國還不能算是我們理想中的中國罷了，

（二）

在宣言的第二部份——一個總清算的一節中，牠說：『春秋戰國形成了我們的希臘羅馬時代，那眞是中國文化大放異彩的隆盛期，但漢代以後，中國文化就停頓了，宋元雖然還有一個新的發展，綜合了固有的儒道與外來的佛學，然而並未超出過去文化的範圍，究竟是因襲的東西。』這在敍述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形態一點上，牠誠然是把握了正確的前提，可是不幸得很，牠並未具體的昭示我們中國的希臘羅馬時代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如當時思想界的千崖競秀，萬壑爭流等等，也不告訴我們中國的希臘羅馬時代之所以結束的癥結，如由於秦始皇漢武帝專制主義的發展，這似乎是美中的不足。至於對鴉片戰爭歷史教訓的分析說：『巨艦大砲帶來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帶來了威脅中國步入新時代的警告，於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動搖，我們乃從因襲的擾夢中醒覺了。』我們固然不可以替帝國主義辯證，說牠之侵略中國是給落後民族以溫和之春，但是在客觀上由於帝國主義之侵略，也是相當的刺激了中國經濟生活的改變，這是歷史辯證的發展，而不是牠們的願望啊。

二月十七日時事新報學燈

論中國本位的文化

魯人

十教授所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劈頭就說『沒有了中國』；

『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

要怎麼樣在現代世界裏面，才有了中國呢？他們叫我們『檢討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因為這樣就能夠『清算從前的錯誤，供給目前的需求，確定將來的方針。』

怎樣檢閱，怎樣把握，怎樣建設呢？他們首先以為在春秋戰國中國文化形成了一個所謂『我們的希臘羅馬時代，』秦漢以後，一直到清末，中國文化，並沒有『超出』過去的範圍，始終是『因襲』的東西。為什麼春秋戰國出現了希臘羅馬時代，而後來一二千年文化竟然因襲下去，沒有新的發展呢？這不能不要追尋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機構，因為有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出什麼樣的思想文化，他們對於這根本問題，始終不加以『檢閱。』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發生了質的變化，於是出現了『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曾李的『洋務』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以至辛亥革命，反映着當時中國資本的抬頭。尤其是辛亥革命，華僑資本的興起，有決定的意義。他們對於這些史實又曖然了。民國革命失敗後，五四運動又來了。五四運動，是以鼓吹文學革命，提倡科學，宣傳民主政治，廢孔孟，剷倫常為鵠的，這一文化運動，反映着大戰時期中國民族產業的活躍，科學與民主政治，不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嗎？文學革命運動，不是改造輸入的西洋文明的工具的運動嗎？所謂孔孟，所謂倫常，不是吃人禮教的結晶品嗎？他們對於這些史實，卻說『民國四五之交，整個的中國，陷在革命頓挫，內部危機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悶中。一般人以為政治不足以救中國，需要文化的手段，於是發生了解放思想束縛的五四文化運動。』顛倒因果，這是如何幼稚的『檢閱！』

他們對於現在的中國的『把握，』與史實離得更遠。他們認為五四運動以後，『新的覺悟要求新的活動，引導辛亥革命的國民黨遂應時改組，政治運動大為展開，……由此形成個偉大的國民革命，其間雖有種種波折，但經過了這幾年的努力，中國政治的改造終於達到了相當的成功。』事實是相反的，所謂『其間……種種波折，』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束縛中國的加強，七八年來，中國民族的危機，已到極點，解放中國，提高中國文化，首先要反帝反封建。

既不能把握現在，無怪他們認為『這時的當前的問題，在建設國家，……文化建設亦當着手』了！

怎麼辦呢？

他們教我們特別注意『此時此地。』

「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他們以為此時此地，就是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的基礎。但此時此地的中國是什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因為是半殖民地的，所以到處遇見帝國主義的屠刀，因為是半封建，所以到處碰着封建勢力的毒箭」（鐵亦石語。）必須先剷去中國社會的兩個毒瘤，打倒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大敵，方纔可以發展中國的思想文化。在現在世界裏沒有了中國，也應該由此下結論。這是我們對於此時此地的中國的認識。不了解這根本問題，不站在正確的立場上，了解文化的建設，決不能「去存」中國古代文明，不能「取捨」歐美文化，結果，這種「中國本位」的文化，只是貨真價實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文化，不是「創造」的，而是奴隸的，不是「迎頭趕上去」而是復古的。這種文化，豈止不是「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枝最勁最强的生力軍，」反轉過來正是阻止着世界進化的支柱。

總之，思想文化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中國文化的停滯是中國社會停滯而已，反映現代文化沒有了中國，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雙重支配下的結果。非擺脫這雙重束縛，中國文化是沒有改造的可能。

不能檢閱過去，自然不能把握現在，也不能創造將來。

「我們怎樣辦呢？」問題依舊原封不動的擱着沒有解決。

二月十八日大美晚報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批判

許崇清

這個宣言的目標一看牠的表題就可以了然，是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而建設的方法却沒有表見出來。宣言裏面雖也列舉着「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幾個條目，仍不過是方法適用上的要求的主觀的規定，而不是方法本身的客觀的提示。這幾個條目所意味的不外乎根據須是「中國本位」的，態度須是「批評」的，方法須是「科學」的，幾個要求而已。至於牠所謂「中國本位」的意義內容「批評態度」

的根本原則，乃至「科學方法」的範疇和這．範疇的進展程序卻未說及。於是這個宣言所以號召於大衆的仍不外是一個目標，而關於如何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的建議則依然無所發見。

即就那方法適用上的要求看，牠所舉出的幾個條目的內面的聯繫是怎樣的，也不明瞭。所謂「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底過去、現在、將來究竟是甚麼的過去、現在、將來？是中國的過去、現在、將來麼？如果是的，在牠既已「沒有了」、「消失了」以後，而在我們則還未檢討過牠，還未把握着牠，乃至還未創造成牠以前，牠的這個「本位」從何得而確定，而拿做根據？是世界列國的過去、現在、將來麼？抱負確是遠大；但牠所要拿做根據的所謂「中國本位」，在這裏又成問題。牠要「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着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枝最勁最強的生力軍，」這一步的進出要怎樣奪得在先，依然茫無端緒。

說到牠所謂「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這「三方面」來，牠所謂「三方面」的區分究竟顯示着甚麼意義？假定建設將來的中國是專業的一方面；在未踏進這一方面以前，由檢閱以至把握以至建設的基本計劃的制定應該就是學理的一方面了。我們「檢閱過去的中國，」如果不是爲着要「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就是爲要「把握現在的中國」；「檢閱過去的中國」和「把握現在的中國」就不能分開。我們要想把握現在的中國，只有在牠的史的發展中去把握牠，去把握那些在形態和方向上規定牠的運動諸法則，指證出「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的真性相，從史的全面看，即中國正在進行着的崩潰的特質。但這個崩潰是在怎樣進行着呢？我們要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先要確認得那「舊」——在這裏「過去的」這個形態就有點不適用——中國的特質是怎樣的；如果不正確的把「舊」中國的特質分析清楚，「舊」中國向着別一形態正在轉移着的運動諸法則就無從把捉。把捉這個轉移的運動諸法則把捉不着，只感覺得牠在崩潰的一面，又看不出牠在形成的一面，建設的基本計劃也無從制定，我們要想建設將來的中國，亦只有順着這個轉移的運動諸法則去做。所謂「現在的中國」

應該就是這些法則的運動所形成，所謂『確定將來的方針，』『努力開拓新的道路，』也不能超越於這些法則以外而有所成就。從學理的準備工夫這見地看，過去——現在——將來只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到了建設事業着手經營以後，踏上了學理和實踐的合一的階段，也是貫通一氣的。這裏的問題的提示就應該是學理和實踐的聯繫的進展程序，建設方案的構成的研究方法的敘述。只寫着『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不過是展開了一串觀念的形式的連鎖，充其量，不過表示着幾個願望，沒有甚麼意義。

再說到牠所謂『在文化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或『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這破題兒的認識的性質。牠的妥當性怎樣？固然，牠所認為已經『消失了』的只是那些『特徵。』但牠所謂特徵究竟是些甚麼特徵？這些特徵何以會歪消失？既消失的有甚麼是怎樣的在代而興起？這些形態和方向的運動諸法則如果弄不清楚，問題的設定不過出於忖度，問題的解決總不外乎臆斷。我們看他的『總淸算。』牠是這樣寫着：『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曾佔過很重要的位置。從太古直到秦漢之際，都在上進的過程中，春秋戰國形成了我們的希臘羅馬時代，那眞是中國文化大放異彩的隆盛期。但漢代以後，中國文化就停頓了。宋明雖然還有一個新的發展，綜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來的佛學，然而並未超出過去文化的範圍，究竟是因襲的東西。直到鴉片戰爭纔發生了很大的質的變動。巨艦大炮帶來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帶來了威脅中國步入新時代的警告，於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動搖，我們乃從因襲的睡夢中驚醒了。隨着這種驚醒而發生的，便是……『洋務』運動，……『維新』運動，……『革命』運動，……』云云，在這上面我們姑且不去搜索牠一面在憧憬着古文化的異彩，一面又喜躍着牠的動搖和轉變的到來的那彷徨不知所向的情緒所顯示給我們的是甚麼？我們只注意看牠在這個『總淸算』上面卻未曾算出牠先前已提起過的所謂『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徵，』那一筆賬來，就可以曉得牠那破題兒的妥當性是尙待證實的，牠所說的特徵究竟是甚麼特徵？牠所認為已失去了的究竟是怎樣失去了？從牠的問題提出的方法裏面我們也無從捉摸。算了吧，但話兩

個問題實在是太重要了，我們如果摸不出一個解決的端緒來，我們始終是空懷妄想。我們有一點心思可以用得到的，我們就應該去用。我們還可以把牠那個『總清算』拿來覆核一遍，看着牠那裏有沒有甚麼機緣可以捉得着的？

那個『總清算』上面是否就把中國文化的歷史的進展的纍起的階段區劃清楚了，現在也可不去追究；牠並沒有指出牠的特徵是極明顯的，牠只憧憬着古代文化的異彩，嘆惜着牠的停滯，忻喜着牠的動搖，企望着牠的轉變。牠始終是溺於情感，抖擻不起牠的理智來，就向牠所嘆息着的這個停滯，牠所忻喜着的這個動搖裏去捉摸牠那又愛又恨的茫漠縹渺的『特徵』？如果牠在這裏能夠回憶一下牠先頭覺得是已經消失了的，為甚麼清算起來，却只見牠是在停滯着；到了砲聲隆隆，總算驀然驚醒了，於是所謂『洋務』『維新』乃至『革命』等思想上，政治上諸運動紛然而起；在這幾十年間世界的轉變是怎樣的，而何以我們的『革命』至今未見成功，道古害今的根性仍是牢不可拔；甚至那企望着轉變的到來的也分明對於往古在顧戀着依依難捨的神態？這究竟是轉變着呢？抑或是在停滯着？那些『特徵』究竟是消失了呢？抑或是在沈澱着？我想無論那個經過這麼一番反省，必定就會豁然開悟，而斷定這確是一個停滯，沈澱的狀態；所謂轉變，消失，不過僅見於上層當風的處所，但在下面則至多不過些頗微纖，稍稍動搖。

如果牠實踐着牠自己所謂『採取批評的態度』那個要求，在那『總清算』裏抓着了上述那個機緣，做過一番自己批評的工夫，從那『消失』的幻覺回復到『停滯』的現實，再鼓起勇氣向着現在科學所已造至的全境去揀選出牠所適用的最犀利的工具——最精確的研究方法，鑽進那停滯着的深厚的沖積土層——這才不是填竅，而是研究資料的寶藏裏，——把那些沈澱着的結晶體——這才不是骷髏，而是問題解決的機括——發掘出來，牠在又愛又恨，但始終只是想望着而從未即近過的那些『特徵』究竟是甚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又何至彷徨在那不毛的曠野上，徒然叫喚着『救世主來了！』却總指不出絲忽可以從而得救的端緒來？

再看看牠所謂『中國本位』這個概念的意義，牠也沒有說明過。牠只寫着『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

識」和歐美文化「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這麼兩句東西。前一句說的只是：現在的中國需要這個「中國本位，」現在的中國的這個需要就是這個「中國本位」所以成立的根據後一句說的只是：「中國本位」是根據現在中國的需要而來的，但現在的中國亦需要「歐美本位，」她既需要了，「歐美本位」也可以吸收過來，作爲「中國本位」如果是這樣，那就不但無以增益我們對於「中國本位」概念的認識，而且把「中國本位」本身的價值也貶損到可等於零。如果說：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就是「中國本位」的，現在的中國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標準。那就充斥在市面上的外國貨全部是供給現在的中國的需要的，也就都是「中國本位」的東西。如果說：不是的，那些需要有許多是中國貨可以滿足的；用中國貨本可以滿足，而不用，纔造出那些需要來的；那些需要不是「中國本位」的；那些外國貨就不是「中國本位」的東西。然則非用外國貨就不能滿足的那些對於外國貨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了；而本來用中國貨就可以滿足的那些對於中國貨的需要自然也是「中國本位」的。這就成了先考慮過中國本身有沒有可以滿足得的那種需要纔是「中國本位」的，而那種需要是否「中國本位」的，就係於是否已經考慮過中國本身有沒有可以滿足得的在先。這個考慮是「需要」以外的。是需要所由而決定其是否「中國本位」的另外一個標準。「需要」既還須另外一個標準來決定牠是否「中國本位」的，「需要」本身就不能做「中國本位」的標準。於是現在中國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標準這個命題也不能成立，然則所謂「中國本位」說的究竟是甚麼？

其實這個概念在字面上已經表現得很明白，就是以中國爲本位的意思，和我們的貨幣制度叫做銀本位的貨幣制度，是以銀爲本位；教育上所謂兒童本位的教育設施是以兒童爲本位同是一套的玩意。所謂「本位」猶如「主席，」意思最後的決定在於牠，牠就是意思決定的最後的標準所在，這是字面上一看就可以明白的。不過字裏面的內容是那樣，卻還要參照着這個字現在通用着的意義去觀察一下，纔可以決定。

我們看所謂銀本位的貨幣制度，是以銀做本位貨幣的質料，以銀所造成的本位貨幣做貨幣計算的標準的一種貨

幣制度。牠的目的在於貨幣流通的圓滑，基本貨幣的種類既經決定。計算單位既經確立，貨幣流通就有了根本要件。參照着這個意義去觀察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這個概念，就可以得到牠的一面，是以中國做本位文化的基地，以中國所造成的本位文化做文化建設的標準的文化帝國的建設，牠的目的在於中國文化領域的展拓。基本文化造成了；文化標準立定了，文化領域的展拓就有了牠的要件，這就是宣言最後寫着的「使中國在文化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着重要的位置，成爲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枝最勁最强的生力軍」的更進一步的工夫。還有所謂兒童本位的敎育設施，是以兒童目前所有個性做標準，以因應牠的自然的發展的兒童敎育設施，牠的目的在於維護兒童現有的個性。參照着這個意義去觀察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這個概念，又可以得到牠的一面，是以中國目前所有特殊性做標準，以因應牠的自然的發展的中國文化建設，目的是在維護中國現有的特殊性。但這一面的意義有須加意的一點。就是偏重於目前所有個性或特殊性的維護，所施敎育，所營建設，反成了消極的，和任牠自然地去發展沒有甚麼差別。前一目的志在向外展拓，後一目的志在對外保護，由前一意義，先行條件仍在中國本身；由後一意義，却又近於無爲。誠如宣言所說，我們已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們是在急謀建設；然則還有甚麼其他意義可以如我們所願的呢？我們走到這裏，已不能再輾轉於字義的考據，只有走從社會科學的方法上試探下可以得着些甚麼是合於我們所要求的範疇的？這一條路纔是我們的正路。

當我們研究社會現象的時候，我們首先遭着的是社會的合則性一個問題，所謂認識社會現象就是發見牠和其他現象的必然的關係，理解這些現象所由而發生的必然性，牠所特有的發展法則，我們要解決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現象的問題，我們就先要研究從各個現象的具體性抽象出來的社會一般，即在抽象中觀察得來的社會的合則性，先認識了牠的抽象的合則性，然後由這個合則性出發而過赴於具體的社會的過程的認識，社會的抽象的合則性和其他抽象一樣是挺實在的；這個合則性不外是存在於各個具體的社會現象裏面而決定其發展的一般的關係，必然的法則。要認識歷

史的發展，也沒有抹煞差別、也要從存在的具體性的抽象過渡於其一般的關係的認識，然後再歸還到具體的歷史去。這時節歷史纔不是皮相的外觀；而是牠的內容和形式的深刻的合一。我們要研究中國社會或中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也只有沿着這條路走，這條路就是從具體到抽象，復從抽象而到具體，即從中國社會的個別歷史的現象的認識而中國社會的發展的一般的法則，復從中國社會的發展的一般的法則而中國社會的具體的形態的認識一條路。這樣，我們的出發是中國，我們的歸結也是中國，詳細的說，我們的具體的研究資料是中國的，從而抽象出來的一般的法則是中國的，而一般的法則於焉適用的也是具體的中國，這豈不就是中國本位了麼？從社會科學的方法上看，必然的就非以中國為本位不可，牠本來就是方法上的必然的內容，在方法上這個意義是所必有的；不說出來，牠還在意會中招展着，說出來，而連說者也把牠混亂了，就變成必然以外的另一課題。拿着這個自成一面的課題，舊八股有舊八股的做法，新八股，洋八股又各有各的做法，必然的就花樣越弄越多，而原樣却越弄越糊塗起來；以至令人無從捉摸。

這樣看來，我們在這個宣言裏除了『文化建設』一個空洞的口號和戀舊嘉新的一種模稜的情緒以外，簡直可以說是一無所得。然則我們又將怎樣辦呢；如果我們要得到這個問題的科學的解決的，我們就要明瞭科學對於這種問題現在所造至的是怎樣一個境地，從這個境地去尋繹問題解決的線索，或根據我們現前的事實去批判這所造詣，得到更深一層的進出，以邇近問題的真相，然後問題的解決纔是『迎頭趕上』的解決，纔是真正地以其所已知，求其所未知。不然，徒高唱着『應用科學的方法』而不知用，或以為是在用着科學的方法；而實則蹈着前人的覆轍而不自覺。必定得不到甚麼效果。

我們看所謂『東洋學』，『支那學』，乃至中國史學現在的造詣，且先看中國本身是怎樣？中國的史書雖是汗牛充棟；但所紀載的不外乎歷代興亡治亂，典章制度兩類的事實；所以整理這些事實的不外紀傳表志編年以便通覽，紀事本末以便綜稽，合上詁釋評論，還未達到科學的境地。日本是怎樣？我們只看她所謂『日本的支那學者』矢野仁一在他的

近代支那史序裏寫的『……在日本雖也有支那流的考證家，校勘家……而史家則似少，』和松井增青等在歷史教育研究會所編明治以後歷史學的發達裏寫着的『就支那史說，可以稱爲史的研究的東西固然亦少，而關於清朝的則更缺』云云等史家的自白，就可以曉得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因爲方法上的欠缺，也暴露着不毛的狀況。『滿洲事件爆發』以後，『支那史研究』更成了帝國主義學者的急務，但仍困於方法的欠缺，牠的收穫亦無所加於從前。在另一方面，如東亞同文書院的『支那研究』，『滿鐵調查報告，』『滿鐵上海事務所研究室，輯『滿鐵支那月誌，』『東亞經濟調查局的『東亞』等近來又譯載着許多應用史的唯物論的方法的關於東洋史的研究和中國經濟分析的論文，而且還以史的唯物論的方法來研究『滿洲的土地形態和地理形態，』乃至研究中國史，分析中國的亦復不少。帝國主義學者而應用到史的唯物論來把捉眞理，其必値得利用以圖別有所穫，可以想見。至於歐美，自 F. von Richthofen 的 "China" 五大卷巨製出現後，在地理學，考古學乃至其他科學諸分野也發見了許多關於中國研究的著作；但一講到中國和中國人的特徵，大抵出之侮蔑憎惡；即有抱着同情的，不過表示哀憐；甚至於罵我們竟『無異於反芻動物。』就是 Richthofen 他一面說着中國人的性質是無從理解，不可思議，而一面却又說着他絕不尊重中國人，他品評中國人此無論那個都低。再講到中國人的保守性，即素來尊重中國人的 F. Otto 在他的 "China" 裏面也只能以此歸罪於生物學的性質的影響。在另一方面，Ma. Dya-Ry. 尤其是 R. M. Wittfogel 又提出了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樣式』問題：要再構成牠的體系，以期有所供獻於這問題的解決，要在中國所經驗過的偉大的經濟的社會的諸變動的影響底下，發現出中國社會構成和經濟構造的本質。從來的 Chinologen 竟至無從下手的許多中國問題因而得了透徹的闡明。

我們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我們又將怎麼辦？首先就要弄清楚文化的概念。文化是甚麼？據宣言所說『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着手，而且更爲迫切。』由這一句話，所謂文化是除開了政治經濟以外的生活諸現象，再看牠所贊美着的春秋戰國的文化的隆盛期和宋明的新發展，那所謂文化只不過

是政治經濟以外的宗教，哲學，藝術諸表象。這個認識對了麼?我們看着現下所謂「文化哲學」的一般論所考察出來的文化生活的全面。罷一派的哲學又稱作「精神科學」文化生活在這個哲學又稱價值生活，如 Spranger 在價值體系論裏考察文化生活中性質各不相同的東西有多少和這些的相互關係，把精神作用分個人的和社會的所稱去觀察。就個人的精神作用看，他發見了（一）經濟的作用，（二）理論的作用，（三）藝術的作用，（四）宗教的作用，共四種，就社會的精神作用看，他發見了（一）支配的作用，（二）社會的作用兩大別，合起來有六個根本的精神作用，就有六種價值。經濟的作用有經濟價值，理論的作用有眞價值，藝術的作用有美價值，宗教的作用有聖價值，支配的作用有政治價值，社會的作用有愛價值，也就有六種價值生活，文化生活，價值範圍從而文化範圍是極廣大的。姑不論他的根本方法和體系設定的對不對，但這是 Kultur 概念的必然的綜合。把政治，經濟擱開是沒有理由的。

文化是和自然對立着的一個概念：文化恆具體的存在於歷史，要追溯牠的起源，就要從人類和自然的原始的關係考察始。人類是自然的一部，是在有機界的發展過程中發生的。所以人類和自然是分不開的。然而人類和自然却仍有區別。人類在發生於有機界的一定發展階段這一點是和自然聯合着的。在有機界則 Darwin 所發見的自然淘汰和生存競爭的法則在支配着。一切生物都被逼於向着周圍的環境覓食，因而就要順應着周圍的環境。這個法則當然也適用於人類，因爲人類也是生物，要生就要食，就要在自然裏找生活資料。然而人類除了和動物相似的這個特徵以外，却還有別一特徵。人類在動物界的一定發展階段發生，却另有和動物相異的一個環境順應法。人類不但消極的順應着自然的對象，人類造出勞動用具來，反而變化了自然的對象。人類從造出了勞動用具那一瞬間，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就轉了向。久已支配着人類的自然變做了隸屬於人類的對象。人類和自然對立起來，人類開始向自然進攻。人類用着他們所造成的勞動用具從自然創造出新自然來，自然的歷史成了人類社會的歷史。人類的文化從此開端。人類的這個創造過程就是生產過程，文化的發展就從生產過程始。

所以要認識中國文化發展過程的特性只因襲着從來的老法子單就精神的生活諸現象去研究，固然得不着甚麼結果，即只探索到中國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也不能發現出甚麼。必定要從在歷史的發展經過中規定着中國的生產過程，從而由這生產過程規定着中國的社會諸關係的生產諸力起首研究。生產諸力有社會的一側面，有自然的一側面。前者是能動的因素，表示着中國人怎樣自己造出我們的歷史文化來。後者是所動的因素，表示着那些在具體的形相雖順應着我們的社會的活動而變化，但根本上則仍不斷的作用着，制約着我們的歷史文化的發展狀態的特定諸條件，自然諸條件。

這不過是研究的發端，以後還有問題應該怎樣設定？中國從來的經濟過程以農業經濟為本，所謂生產諸力的研究應該首先就是中國的農業生產諸力的特質的研究、中國農業生產諸力的特質闡明了中國的農業生產過程，農業生產樣式可以分析出來，農業經濟在中國社會既佔着支配的地位，農業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特質。而要明中國的農業文化發展的全相還得把順應着中國的農業生產樣式而演成的中國的工業的生產的基本諸要素乃至商品流通諸關係一併分析清楚。生產過程和變換過程都考察過，中國的社會的生活諸形態的全面由此展開，從而發生的精神的生活諸表象所提起的問題得着合理的解答，中國的物的生產、社會秩序、生活諸形態和思維諸形態的基本諸特徵和運動諸法則，即中國文化發展過程的全相可以明了。按着這個問題設定的程次去考察中國社會的生活諸現象就得了和我們的文化問題關係極大的如下一個敘述。

中國農業經營的褊小、零碎已經成了常則。中國農業經營的褊小、零碎，這個事實使中國農民只得做薄的收益，辗轉於窮苦的絕地，農具極簡單，所憑的全是自己的勞動力，土地的合理的利用，僱傭勞動，驅養役畜的合理的役使均非所能，在這種機構裏面生產力的發展是停滯着，農業生產的這個樣式規定了工業生產的形態和限境。在農業方面，農民也可以利用無需代價的自然力做補助，而在工業則只能靠着低廉的生活資料所維持下來的勞動力。工業品比農業品價錢

總求得高工業生產者就不化錢在高價的工業品工具上頭，以求質的改善，以致把產品的成本弄大，提高了產品的交換價值，反礙推銷，而專購用低廉的勞働力，以求產品量的增加、節省勞力的機械在中國上古就有了；一向也沒有發展，卒不能成爲支配的勞働用具。中國工業的發達只見諸勞働的精練，勤苦等主觀的生產力的發達，而工具、機械則仍停滯在原始狀態。再從中國工業品的流通、需要看，有農村的需要、封建的官僚支配者的需要和商人的需要。但這三種需要的來源，歸根是由於農業勞働生產力的增進，來源停滯着，這些需要亦不能獨自向榮。農業的生產力的發展停滯着，工業的生產力的發展跟着停滯了，當然和工業的生產的成長關聯着的自然科學的發達也止於經驗的蒐集和觀察的所得；縱能發見許多問題的提起和原理的發明，亦無由造至科學的體系，卽其他精神的生產也不能超出這個產業秩序所關係着或反映着的觀念的問題的範圍以上。而貪官汚吏，土豪劣紳，操奇商人，高利債主的發展纔剝削着小生產者，巧奪了他們的田宅財物以廣其蓄積，終不能轉化到產業資本，在社會內部除了經濟的頹廢，政治的墮落以外，遂亦無所結果。

鴉片戰後，妨害中國的經濟的發展的政治的要目以關稅自主權的喪失和工業專有權的喪失爲最大。中國的關稅事業和關稅行政都在國際列強掌握。中國的新工業無論如何榨擠着勞働者的汗血，總競爭不過那些大工業國。再加上重重釐金、雜稅、本國工業的受害更形慘酷，五港開放當初，外國工廠的設立還不過是本着習慣做去的，馬關條約竟以明文規定了日本人可以在中國從事各種製造業，跟着帝國主義諸國並起而要求『利益均霑』，就公然設定了一般工業投資權，中國國民的工業專有權竟又失去。帝國主義諸國不但可以拿貨物進來換我們的現銀出去，更可以拿資本進來直接剝奪我們。在兩重夾攻當中中國資本的新工業至多不過得在外國資本的手縫下掬取些少餘瀝，規模稍大的企業固所難能；卽勉强撑了起來，也禁不起外國資本的一擊。在政治的、經濟的壓迫的這樣的形規底下，中國舊社會構造的破壞決不是意味着新社會形態的生成而是促迫着一般生活水準的降低，窮而無告的老百姓的流離失所。買不起外國工業製品的貧苦的消費大衆的幾微的購買力一息尙存，舊式的手工業的小經營和家內工業的小經營就睹着饑餓，對於

外國工業製品仍舊顯示着頑强的抵抗力。農業經營的新形態無從發生，零碎小農生產體系陷於絕地，也只得死守着老舊的勞動樣式在那裏撑持。從來的生產機構很强韌地至今還站立得住。中國的生產有機體的這個强韌性反映成現下中國人對於舊有文化的態度，就是不必知古而但好古的一種奇妙的情緒，乃至未嘗考古而思復古的一種莫明所以的念頭。向來隨着朝廷閥族的榮枯隆替而消長、聚散無常的舊有的文物、典籍、禮制、儀節的僅存的殘編斷片，乃至跟着歷史的推移而變易其內容的仁義道德的未墜的虛名假相，就附麗於這種情緒，這種念頭而得以延續至於今日。這個强韌性反映成對於西洋學術的態度就是『西洋學術不適於中國』一個臆斷。就是那些主張『全盤接受』或『取長捨短』的其實也不外是現社會的這個强韌性在作梗，以至理解不透西洋學術的本質，更無從而領會得社會發展的有則性，只素朴地以平日選購洋貨的習慣施諸學理討究上面弄出這麼一個空想。一般大衆的理解當然更是非科學的，甚至非論理的依然停滯在前科學的狀態。

這是極簡略的一個敘述，小小一個結算，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小結算。但這盤賬却是來源去脉筆筆清楚的。我們看了牠就可以明白中國從來的社會生活的內在的矛盾和本質的危機是甚麼種類的東西；這些危機從那兒發生，向那兒消滅，都可以由此決定。中國文化的發展因何而停滯着，中國文化的再建設從何而着手，也可以由此推斷。文化的再建設其實就是社會的生活諸形態和精神的生活諸表象的再建設。而從文化的本來的性質看，牠既然是和自然對立着而驅使自然為其發展的資籍，則工業的發展比諸農業的發展在文化的內容和形式的寄與上都更豐富而偉大，愈能操縱自然以為其所用的，其所造就必愈高，是以中國文化的再建設運動的開始雖在農業生產力的增進，農業危機的消滅，而其實績的發展則只能期於工業的成長。工業的發展，和農業的發展一樣，非只由於獨一要因，實由於互相協動的諸要因的複合體。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的自然的諸基礎是充實的，其他如勞働者的性格效能，勞動的組織，科學和科學在技術上的實用性的發展階段，尤其是勞働用具的性質等要因中，成問題的在目前的中國就是科學的思考力，科學在

技術上的應用力的發達和勞動用具的性質的變革。而最大的妨害必然還是帝國主義諸國的經濟的、政治的侵略。

在文化的發展中並且直接地行施着教育的作用。這原是社會的根本的機能，是社會的生活諸關係和精神的生活諸現象的相互間，和各自的領域內的彼此間的相互的作用。這個互相作用於其究極是行施在自為發展的經濟的必然的基礎上面。這個相互作用本是至微妙，至繁複的，文化所以被看作和教育是同一事體亦由於這個作用的存在。但教育被看作文化的時候，文化概念的意義就跟着教育概念的意義的變化而變化起來。一般偏執於觀念的人們以為教育是觀念的領域內的事，文化也被限定在觀念的領域裏面。文化、教育的範疇就縮小了，社會的生活諸關係的文化的意義，教育的作用，都被抹煞；政治制度，社會構造，產業組織的文化的價值，教育的機能，都被剝去。文化、教育活動的形式就只有觀念的傳播、灌輸的一途。而社會的要因的發展、改造，卻被置之等閑，或被視為與文化、教育絕不相干的事。結局，觀念的傳播、灌輸的效力，亦為原在作用着的社會的要因的活動所阻害而歸於無有。概念弄不清楚，實踐起來，萬事就這樣的終於落空。

要明白了社會發展的法則就是文化發展的法則，社會發展的法則就是教育的法則，社會再建設的一切事業的統一的目標就在社會的文化的價值，教育的機能的發展，文化、教育再建設運動纔有意義，纔有實效，文化、教育再建設運動的內容纔得豐富而偉大。

文化建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評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

馬千里

一九三四年，中國隨着整個世界經濟恐慌的侵襲與一切內亂外侮的夾攻，一切政治經濟都同樣顯出衰頹的現象。就是那國魂所寄的文化領域，在這一九三四年，也是到了最最衰頹的一年；無論在思想界，教育界，出版界，我們如果不惜化費時間去檢視他一番，我們就不難明瞭，一切的一切俱在日暮窮途[illegible]圍深山的淒慘境遇中殘喘着。不信；你看，整個的

思想界，不是除了充滿著『投機』『頹廢』『野荒』『空想』的氣氛外，就只有一些專販『外國野人頭』的洋場騙子在跳梁跋扈嗎？整個教育界，也依然是被封建的因襲勢力佔着重要地位，真正爲國家民族謀出路的教育，仍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至於整個的出版界，更是漆黑一團，除了爲兩種——在出版界造成了封建勢力的書賈，在政治舞台上退下來的失意政客——惡勢力籠罩着以外，還有什麼？中國的文化界，既是那樣的衰頹不堪，因此就直接影響到使現實社會分別暴露着？全國政治只有分解的趨勢，大多數的青年浸沉於邪說跛形的空氣中，各種反動勢力利用政治勢力不團結，就在黨內黨外暗滋潛長。好了，這回想起要令人傷心落淚的一九三四年總算已無聲無臭的溜過了；我們在迎着似乎含有朝氣的一九三五年的開始，首先映在吾人眼簾裏的，就要算那沉悶在迷惘中的文化界，異軍突起地來一羣十位教授署名的富麗堂皇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了。在這日薄崦嵫的中國文化界中，竟有這麼一套迎頭趕上的壯舉，多麼的差强人意啊！我們姑不管自從『九一八』日本在瀋陽一炮以後已把中國的歷史劃分了一個時期，思想改變了方向的現時，是否允許你從容不迫的建設文化！我們更不管在眼前民氣這樣的沉鬱，瘖默；民族生命這樣的搖搖欲墜的當兒，是否允許你去從事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我們還不管在這拉人養士相習成風的環境裏，是否允許你毫無牽罣的去努力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這裏，僅就我讀了那篇宣言以後；所覺得要說的話，簡略地寫出來。

對於這篇宣言所述的立場，大體上我是表示相當的贊同。因爲它所標榜的信條：

『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不錯！『不守舊，』『不盲從，』本是現代人所應持的態度，不光是對於研究文化應當如此的。可是，問題還是有的——所謂『不守舊』『不盲從，』依然是一個空洞的說法我們該在說『不守舊』『不盲從』的時候，連帶確立一個目標；要怎樣，才是不算守舊，才是不盲從，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態度，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強人必從，終不是一件容易事。譬如某種制度，某種思想，在你或許認爲是滓濱，是陳腐，不合國情，不切需要，是應該淘汰的。但，難保沒有別人偏要認爲是，這是中國文化的

精華，偏要主張應該加以發揚光大，偏要以「士不能誦孔子之經」的理由來努力衞道，來矢志守舊。你儘管說他是主張文化的復古，他偏只承認是反抗文化的投降。這些這些，確是勢所難免的事實。所以究竟所謂「守舊」係何所指？所謂「盲從」又何所云？該先有一個明白的指準；要不然買空賣空，標新立異，不但於事無補，抑且無人領教。因此，不論在中國舊文化上，在歐美的新文化上，何者應歸淘汰之列？何者應在保存或採取之列？在努力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領導者，應該先給人們以一個明確的指示。

統觀宣言全文，覺得下面的幾句確是針針見血，萬分正確的警語；「中國不是任何一地的中國，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中國是現在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僅僅根據這幾句話，就可以知道十位教授所努力建設的中國本位的文化。一定是在看清了此時此地的中國的需要以後而推斷出來的。可是，令人遺憾的事還有；究竟此時此地的中國的需要是些什麼？雖然這篇洋洋大文的宣言，極盡豪宕生動之能事；然而徹頭徹尾，却跳不出這一個要點。好比醫生替病家診察；光是把能治百病的藥性賦，湯頭歌訣，對病家頭頭是道的說得興會淋漓；而沒有把病家的病象開個醫案，把病家應服的良藥，臚列出來。同樣的無裨事實。因此，我更感覺到，中國本位的文化，究竟是些什麼？究竟怎樣可以建設起來？決不是僅僅靠幾句闡發式的文章所能蕆其事。因此，我更很虔誠的希望着，發表那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十位著名教授，已對現時現地的中國，具下了一個徹底的認識！同時，還馬上確立一個比較可以維繫人心的公共信仰！

本來，在這個年頭，做事真不容易，無論什麼事，只要有人做，就有人說閒話。但，做事的人，決不能因為怕人說閒話便不去做。就拿文化建設方面的工作來說，這是何等重要的事！然而事實上空談的人不少；實做的人有幾個！再加以做的人還沒有做出一個所以然來，說的人已在吹毛求疵地亂嚷，這真叫人灰心！不過，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從事文化建設的人，如果真能埋頭做去，多做事，少說話，不管無謂的譏諷，矢志彌堅的做下去，也決不致於一無所獲。所以，問題的癥結，還是由於從

事文化建設的學者文人，總脫不了多『說』少『幹』的毛病。說起來，何嘗不天花亂墜，悅耳動聽；實際上却老是貿空買空，拿不出一些眞正的貨色給正在洗耳恭聽着你的議論風生的妙語底人看看。試想，過去在文化界活躍過的，恐也不在少數，而今往事回溯，能有幾何還找得到！主義多如牛毛，學說五花八門，舊文化固遭破壞，新文化却何嘗產生！所以，此後從事於文化建設的人，若不先把這種帶有遺傳性的毛病革除，恐怕任何事情都建設不起來。這裏，謹以萬分誠意，希望十位敎授，在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後，少說多幹，馬上能有貨眞價實的東西——去其渣滓，存其精華；捨短取長的工作——給人家看。千萬不要因別人故事吹求而灰心，而重蹈說異方，賣假藥的窠臼。 三月一日上海大夏晚報

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王伯綸

自十敎授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發表以後，確實是在中國文化界裏掀起了一個很大的波瀾。數月以來，各報章雜誌，無論是好意地或是惡意地都在熱烈地討論這個問題，而許多名流學者也都大發偉論？還却是充分的證明了『在文化的領域內，我們雖然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雖然已經失去了牠的特徵。』但還有一部分人期望着中國民族之復興。

的確，十敎授的主張，在原則上是爲吾人所不能否認的。我以前在文化再建運動的理論與實際一文中亦曾如此主張道：

『……中國現階段的文化運動之本質，很顯然，既不是先秦諸子的學說之復興，也不是中國神權政治之改造，（五四文化運動亦盡其相當之任務）而是重新建立適合新中國社會形態的文化，（這種文化之內容自然是含有反封建的本質）此文化之建立的運動，卽吾人所謂中國文化的再建運動。……中國現階段的文化再建運動之內容，必然是反玄學的，反機械論的，反實驗主義的，反頹廢思想的，而並且是需要積極地提高文化的水準，提倡敎育的普及』敎授與作

家」（一卷二期）。

以上的主張可以說在某一點上是與十教授的意見不謀而合的。不過，我認為在十教授的宣言中仍有令吾人不能滿意的幾個缺點。

第一，在宣言中，十教授只知道在文化的領域中沒有了現在的中國。而沒有指出在文化的領域中為什麼會沒有了現在的中國。要知道現在的中國正是處在次殖民地和崩潰中的封建社會這一個形態之下。唯其如此，帝國主義及封建的勢力在中國遂時時作祟，所以在文化上才有『有的拚命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有的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脚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衆生的繩。』十教授忽略了這一點，宜其在提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之結論中而忽視了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反帝反封建的意識形態。再十教授說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却沒有說出什麼是中國的獨特的意識形態，試問中國獨特的意識形態是什麼？中國獨特的意識形態難道不是由中國獨特的社會組織及制度所決定的嗎？在下以為依照中國獨特的社會組織及制度的本質，其獨特的意識形態應是向上的，進取的，集團的，有戰鬭精神的，反封建的，促進大同世界之最高理想的；……除此而外，我們以為中國現在是停滯在農業的封建社會和工業社會的變遷時期，在這時候，主張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這不是使人要誤會十教授之所謂中國獨特的意識形態乃是一方面適合農業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適合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嗎？

第二，是在十教授的宣言中提出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的辦法太空洞而不具體，不錯『把中國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是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的，……』但是中國過去的一切何者當去，歐美的文化何者是糟粕，何者是精華，現在中國所應吸收歐美文化者又為何？統應具體指出個大綱出來，否則，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沒有具體的辦法仍令人會誤解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一套舊把戲。自然，十教授或者可以反駁我道我們僅是表明態度呵；但西哲有言：『眞理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外交式的辭令是無補於

實際的。

第三，在十教授的宣言中沒有積極地把最近政府對於言論自由的主張擴而大之，因為要想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而「既要自我的認識與夫世界的眼光，又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與夫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以及要想使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如旭日東升日趨繁榮，束縛思想的政策是萬萬做不到的。有自由之花始能結自由之果，不把握住言論自由的主張，結果是固步自封抱殘守缺，豈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之可言。不過，集思廣益，博採衆見的工作，十教授是在實踐了，這就是證明中國文化之建設，言論自由實為重要前提，十教授雖未明言而卻力行了。

然而十教授的宣言，雖然有以上的缺點，但仍不能抹殺其歷史的價值。在現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日益深刻化的場合之下，失卻自信心的中國人，更見畏縮而志氣消沉了。加之，隨帝國主義經濟政治侵略以俱來的文化侵略，更使我民族日陷於五里雲霧中而不辨何去何從。如果沒有十教授之振聵發聾的怒號，長此以往，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真是不堪設想，別人的侵略固然可怕，忘掉了「自我」的民族何嘗不是危險？十教授的宣言，誰都不能否認她是中國民族解放的覺書。

三月十一日上海晨報晨曦

一十宣言與中國文化建設問題批判

葉法無

一　問題發生的原因

帝國主義侵略的壓迫

內部改革運動的失敗

情感產生了惰感

二　宣言內容的檢討

一　問題發生的原因

一切問題與思想的發生，都有社會的原因。「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十教授的文化建設的思想的發生，也是有社會的原因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我們看來，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日益加緊與中國內部的改革運動的失敗。因為由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與改革運動的失敗，中國的社會已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幻想！第一，過去自給自足，家族主義的和平的社會生活，固然是夢一般的被帝國主義的砲火打得粉碎，同時帝國主義者又以其最新的機械，各種的商品，以及浮士德的思想，習慣，也強迫中國人去採用，實行。因此，中國人民所受到的損失，犧牲，刺激是非常厲害與深刻的，亦為自有中國歷史以來所未曾遇到的。許多生命財產已被侵害，而土地也不能不割讓，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就是中國重大損失的證據和死刑的判決。所以結果在政治經濟方面，中國已淪為次殖民地，而在一般的文化方面，思想，教育，藝術，而至於風俗，起居飲食的方式，也無一不受西歐文化的影響，或強迫採用，或有意模做，中國人民的心理已無形中成了殖民地化的心理。一方面原因中國地理的廣大，外來文化的影響與發展的程度未能一致，於是一方已西裝革履，洋房汽車，跳舞享樂，討論科學方法，社會進化的理論，物理化學的定律；而一方卻又囚首垢面，欲求一飽而不可得，或膜

拜神像，口唸阿彌陀佛，其矛盾百出，的確充分表現了現代中國文化的沒落。

然而以上的事實，帝國主義的壓迫，還不要緊。最痛心的則是由此種壓迫而生的，數十年來中國民族的改革運動的失敗，一直到了現在經過多次的鬬爭，流血，犧牲，不但帝國主義的壓迫的痛苦未能解除，而且日益嚴重；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造也沒有多大的成績與希望。且年來由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天災的流行，土匪的橫行，農村的崩潰更增加其速度。中國社會，中國人民在重重的壓迫之下已陷於絕境，整個民族的心理也入於異常煩悶的狀態。中國民族的命運，唯有死神能預知其末日。

但人類終是求生存的，叔本華（Schopenhauer）說：「宇宙萬象的成因與變遷爲生存之意志所造成。」中國民族是人類，當然也不能逃出宇宙本體的支配。然而我們怎樣辦呢？因事實的教訓，力與力的比較，國術決難以禦犀利的槍砲，目不識丁的兵卒也難以明瞭爲國犧牲的意義。所以以民生凋敝，生產落後，技術幼稚，沒有組織的社會，欲抵抗帝國主義是要失敗的。同時已失望而懷疑的人民的心理，亦難鼓起其熱情與勇氣，以作革命的直接的行動。抵抗帝國主義，或直接的革命行動，都爲種種的條件所限制，而至於不可能。

目前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社會心理的狀態，的確已到了極度苦悶的程度。就是在此種環境當中，所以一部分的知識階級，以其豐富的情感，優美的文字，便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欲以文化運動的方式，文化建設的口號，來推動中國社會的進化，復興中國民族。欲於將死的民族命運中，求自覺的自我的解放。此種宣言，在動機方面看來，是光明的，在效果方面看來，也有如沙漠上忽遇到清泉，嚴冬中突來陽光一樣。因爲苦悶已久的中國人民，消極了的心靈，無處洩其意願，正在徬徨歧途的時候；忽接到一十宣言，提供我們一種建設文化的方向，最低限度在精神上實在得到不少的安慰。此種宣言雖是出於共同的集團的方式，然其刺激性眞有如盧騷（Rousseau）昔日對於文化問題所發表的言論一樣，感人至深。然而情感終於產生了情感，一十宣言也只有情感的表現而已。

二　宣言內容的檢討

在上面我們已經把宣言發生的原因背景加以分析了。現在我們要進而檢討宣言的內容。宣言的內容最使人注意的，第一就是沒有了中國的判斷。沒有了中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沒有了中國的程度到了怎樣呢？我們先來看宣言的說法，在宣言上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對面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蟄伏的嚴寒中，沒有光，也沒有熱。為着尋覓光與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有的雖拚命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有的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脚，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衆生的繩，把他們吊上光明溫暖的天堂；但骷髏是把他們從黑暗的邊緣帶到黑暗的深淵，從蕭瑟的晚秋導入凜烈的寒冬；傳教師是把他們懸在半空中，使他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虛無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結果是同一失望。」從這一段看來，所謂沒有了中國並沒有說明沒有中國的原因與事實的證據，只是描寫現代中國人在重重的壓迫中尋求文化出路的狀態。尋求出路的狀態怎樣呢？具體一點說，就是拚命鑽進古人的墳墓中去。這是不錯的，如近來之復古運動，讀經，存文等的事實。第二，抱着歐美傳教師的脚，這也是事實，如教會的種種活動等。然而這只是一種尋求出路的狀態或錯誤，算不得沒有中國的證據。這是第一點。

宣言上接着又說？「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根據這一段看來，所謂沒有了中國，更加以肯定，而肯定的中心點則是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都沒有中國的特徵。因此，我們就要問什麼是中國的特徵呢？具體的說，如果過去中國的政治形態是君主的專制，社會組織是家族主義的封建社會的組織，並思想的內容與形式是倫理主義的形式主義與佛家的消極虛無的出世主義，都是中國的特徵。若使失去了這些特徵，即算是沒有了中國的意義，則中國失去了這些特徵，也沒有什麼多大值得悲觀的地方。不然宣言的主

張就要回到與羅馬古人的墳墓中去的復古運動相同，這顯然是一個疑問。

在宣言上繼續又說：「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以這點看來，其主要的觀點是要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使中國的政治，社會，思想都有中國的特徵。這要從邏輯上看來更使人懷疑了，因爲上面已經說沒有中國，而這裏却要來建設有中國的特徵的中國本位的文化，那麼有中國的特徵的文化不是復古的文化嗎？如果不是復古的文化，便沒有「有中國特徵的中國本位的文化，」都是極明顯的。這是第二點。

但十教授或明知此種理論有復古的危險，於是又說：「要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我們應在這三方面盡其最大的努力。」這點自然是宣言的最大的貢獻，然已與上文不相聯繫，同時批評的態度與科學方法是否與「有中國特徵」的東西相容呢？因爲有中國特徵的東西，大部分都不是批評的態度和科學方法能夠承認的。因此，要以批評的態度和科學方法，來建立有中國特徵的中國本位的文化也就要成爲絕大的問題，這是第三點。

以後在宣言上所提出的是所謂「一個總清算」的說明，在總清算上歷數中國文化變遷的趨勢，而至於現代「洋務，」「維新，」「革命。」以及目前英，美，蘇俄，意各國不同的潮流的互相在中國文化領域中爭取勝利的混戰狀態。這是事實的敍述與判斷，然而也有兩個疑問：第一，在宣言上說：「新的覺醒要求新的活動，引導辛亥革命的中華革命黨應時改組，政治運動大爲展開。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聲浪遍於全國，由此形成了一個偉大的國民革命。其間雖有種種波折，但經過了這幾年的努力，中國的政治改造終於達到了相當的成功。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建設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着手，而且更爲急迫。」現在我們要問什麼是文化？政治，經濟是不是在文化範圍之外？政治，經濟的建設是不是屬於文化的建設？假定政治，經濟的建設是在文化範圍之外，那末在宣言上所說：「除却主張模

做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倣蘇俄；一派主張模倣德意。」這裏所謂模倣，不知是指模倣什麼了？如果是指模倣科學，則英，美，德，意，蘇俄的科學皆相同，均應一致模倣。若使是指政治，經濟，則中國的政治，經濟的建設，在「政治改造終於達到了相當的成功，」「經濟的建設既已開始，」當然沒有再根本去模倣的必要。這樣在宣言中主張不要「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不要去模倣英，美，蘇俄，德，意的意思究竟是指什麼呢？也是一個極大的疑問。第二，總清算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是要指明過去的錯誤，則最少應將現代以來中國種種的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運動，均應詳細分析其發生的原因，背景，結果，從而指出其錯誤與失敗，加以事實的判斷。但在宣言中，僅提出「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並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有「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這樣簡單的一個分析，已不足以證明各種運動的失敗的原因，亦不足以說明不當模倣的理由。所以事實的分析已不足，事實的判斷當然也陷於模糊了。這是第四點。

最後，所謂『我們怎麼辦』則重加肯定「要求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同時更提出幾個基本的原則。這些原則在一般的意義上雖然要當然也未免太過空洞，如「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不錯此時此地的中國，有此時此地的中國的需要，但需要的是什麼？需要的標準又怎樣？却一點也沒有說明。只提出「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幾個最空泛的原則。對中國的特徵在上面已沒有說明，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也沒有一個適當的定義，所謂此時此地的需要又沒有說出標準，這樣我們怎樣能夠去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呢？一切都成了極大的問題，這是第五點。

以上所說的五點都是宣言的最大的缺點，或是令人發生疑問的地方。因此宣言雖能鼓動我們的情感，但也只能鼓動我們的情感而已。

三　文化問題與中國文化的建設

上面我們對於宣言已加以檢討，現在我們要來對於文化問題與中國文化的建設作一般的社會學的考察。

我們要討論文化問題必先明文化的意義，文化的意義解說至不一致，我還是採取我自己的定義，我前在「前途雜誌」一「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文上，有以下的一個文化定義「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特徵，在人類生命的進化中，因宇宙力與生命力的接觸，人類不能不與自然鬪爭，由鬪爭的結果，於是產生文化。所以我們從考古學，生物學，人類學，歷史學的研究，均可以發現人類文化創造的艱難與鬪爭的遺跡，體驗生命創造的偉大。因此所謂文化在生活方面看來，它是社會的風俗習慣，制度，工具，物質文明。但在另一方面看來，它是社會的團結力，思想的系統，種種的信仰。故文化在其表現方面是物質的，然在其全體的意義看來，却是精神的事物。」

文化的意義已明，我們可以進而討論文化問題了，我們以為文化問題可以分為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文化的本質或實在的問題

第二，文化的價值或選擇的問題

關於文化的本質的問題，就是文化的科學的問題，從邏輯方面看來，是屬於所謂事實的判斷的範圍。它的問題頗繁雜，一，文化現象的實在的客觀性，二，文化現象是否是一種科學的對象，三，文化的科學研究的範圍，包含這些基本的問題。申言之，就是什麼是文化？文化的意義，特質，範圍，內容，形式，以及其發生的原因條件，演進或變遷的定律。文化與地理，生物，歷史，社會諸方面的關係。這些問題的研究其涉及的科學頗多，從一般的方面看來，全部人類的知識都是它研究的對象，由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而至於文學，藝術等都是牠研究的對象。擧例說，如數學的歷史，數學的任何一種理論，亞拉伯人的代數，從文化方面看來，都有一種極重要的意義。若從基礎方面去看，最少有哲學，歷史，地理學，古物學，民族學，社會學等是不能缺少的。然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應總屬於實證的社會學，或黃文山先生所創造的所謂文化學的研究的範圍。至其目的則在於以科學方法去發現文化的客觀的定律，以組成邏輯的事實的判斷。

其次，是文化的價值的選擇的問題，在邏輯方面看來，是關於價值的判斷。其問題亦極困難，一，價值本身的意義，二，文化價值是主觀的抑爲客觀的，三，價值有無一定的標準，包括這些基本的問題。

文化價值問題的發生是近代的事，在從前因爲地理的限制，各種文化都是獨立的發展，且其時人類社會的文化創造，只有因各自不同的環境，而努力尋求適應與發展，只有創造的或建設的文化問題，沒有文化價值的或選擇的問題。然文化價值的問題，究竟怎樣產生的呢？文化價值的問題究竟何人提出的呢？在我們看來，第一個提出文化價值問題的人就是近代情感主義的教主盧騷。而文化價值問題之所以發生的原因，也是由於文化本身的發展或進化的結果，由文化進化的結果，第一，文化本身的累積，如知識的進步，技術的進步，交通的發展，隨之人類的慾望與要求，爲之增加，社會本身也增加其矛盾。第二，不同文化的接觸，當初因環境的不同，於是適應的方法各異，許多民族創造出不同的文化，而其程度至不一致，由文化接觸之後，比較隨之而生，如東西文化的接觸。由以上兩個原因，文化價值的問題便發生了。

關於文化價值的問題，本文的作者曾於民國十七年時著「文化評價」一書，係以哲學的觀點說明人類文化創造的各種基本的模型，如科學，藝術，道德，宗教的根本的及其本身的價值，與創造不息的理性在文化進化的領域中的重要。其後在勞大社會系主講社會學，更提出「文化價值的進化」爲演講的主題，歷時凡兩載，共四個學期，則以社會學的觀點，說明文化價值進化的趨向，以爲文化的價值，就是社會的實在與社會的需要，凡是有價值的都因爲他是社會的，文化的價值是社會生活的產物，至其進化的趨向，一爲同化，二爲分化兩種趨向。以 是個人對於文化價值問題的研究的結果的一點見解，這些見解到現在，作者還是毫無變更。

現在，以上我們對於文化與文化問題的基本的觀念和分析如果是不錯的，則目前中國的文化建設問題，雖與文化實體的問題有極大的密切的關係，然亦應屬於文化價值的問題的範圍。然而文化現象是一個社會的自然現象，新文化的產生或一種文化系統的選擇都不是我們可以任意設計或採用的，文化價值的判斷不是憑空可以製造的，因爲文化

是社會生活的產物，而文化價值的判斷不是個人的私見可以決定的。所以目前中國文化的建設，新文化的價值的選擇，必需從社會的趨向與社會的需要中去尋求，但我們怎樣能夠認識社會真正的趨向和社會的真正的需要呢？從而決定文化價值的選擇，文化建設的路綫呢？在我們看來，唯有實證的社會學的研究足以告訴我們目前中國文化建設的應走的路綫，因爲實證的社會學不僅是客觀的科學，也是價值判斷的科學。

關於中國文化建設的問題，本文的作者年來曾以社會學的觀點所發表的文字有「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出路」，「中心思想的建立，」「新原則的需要，」「實證主義與實證主義的文化，」「實證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建設」諸論文。現在更將主要的觀點總合起來，作爲本文的結論。

在我們看來，目前中國文化的建設應特別注重的有：

第一，民族生存的原則應高於一切，因爲中國民族的生存到了現在已發生絕大的危險，所以民族生存不僅是目前社會最大的需要，也是一切問題的先決問題，我們應以最大的努力，以求民族的生存。

第二，中國民族的文化不是單純的文化，在過去除自己創造的文化之外，曾受印度文化的影響最深，而近來則爲西歐文化所支配，在今日中國的文化唯有從西歐的科學文化中去尋求自立的出路，因此，目前中國文化的建設，應確立科學的實證精神，我們宜急應社會的要求，以最大的努力去發展實證的自然科學與實證的社會科學。

第三，目前中國民族所缺乏的爲物質的經濟的生產，社會一般的需要，也是生產的不足，因生產的不足，於是貧窮爲普遍的現象，貧窮的結果，民族道德日漸墮落，精神生活日益萎靡，所以目前文化的建設，應以最大的努力，從事生產的建設，以求實業發達，民生充裕。

第四，目前中國社會所缺乏與需要的，爲合理的一般的普遍的統一的各種組織，如職業團體等，我們的文化建設應以最大的努力從事於此種社會的組織，使全國的羣衆均能達生存的與發展的目的，使全國無「無可告之民，

『使生存鬬爭有合理的軌道，而從事於文化的創造。』

如果文化是一個自然的現象，文化價值的判斷，應以社會的需要為唯一的標準，則目前中國文化的建設應從事於以上所舉的中國社會目前最急迫的需要去建設，是毫無疑義的，我們亦唯有從事於上面所舉的四大社會的需要去建設，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才不至僅有空泛的宣言。

中國社會第一卷第四期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批判總清算

李立中

一　這樣那樣的意見

被世界巨流破碎了的整個中國社會，在它行將瓦解的前夕，突然出現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這，或許是中國文化運動發展之史的過程中，最後一剎那的掙扎，歷史演進的必然現象罷。

誠然，中國現在是在『萬象蜷伏的嚴寒中，』它『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這裏，有孔孟偶像的復活；這裏，有釋迦香煙的繚繞；這裏，有德謨克拉西思想的憧憬；這裏，有法西斯蒂理論的醞釀；這裏，更有布爾希維克學說的流行。然而這些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現象，無疑的，正是變質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反映。有了這種變質的社會底畸形的發展，當然，在它上面存在着封建思想的殘餘，資本主義文化的形影，以及社會主義思維的根芽，各有活躍的領域，各有滋長的土壤了。

所以要在這種畸形的特殊的社會裏，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淘汰舊的去其渣滓，採取新的，取長捨短；這雖不是穆爾的烏托邦思維，但却是一件異常煩難的工作。

是的，『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這些話，誰能否認？誰不

賓問然而成爲問題的，是適合於「此時此地的需要」的「中國本位文化，」它的性質是以何種爲標準？又，那一種文化，是適合於「此時此地的需要？」

這是很有趣的，對於這問題的答案，當「宣言」列出後，各種各類的意見，有如雨後春筍的紛然雜陳，根據文化建設座談會席上：劉湛恩先生主張基督教式的中國本位文化；黃任之先生主張承繼清末的遺產，建設「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中國本位文化；陶百川、何西亞等諸先生，則提出三民主義的中國本位文化；潘光旦先生則發表「人文主義」的中國本位文化；還有，李麥麥先生竟大聲高呼資本主義的中國本位文化！這些，都是你有你的哲學，我有我的哲學，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名流學者的議論，若再當此下去，我想，中國本位文化，不特不能因此得到更深切的認識；而且，或恐愈益加強了黑漆一團的色調。

因此，我們深切的感到，有根據客觀的現實，予以個別廓清的必要。

二　文化的本質

首先，我們必須把握住文化的本質。

這是週知的史實；文化的基礎，是建築在勞動之上。波克洛夫斯基說：「文化是與自然不須我們勞動，而單只給與我們的東西不同，它是由人類勞動造成的東西的總體。」勞動，不僅限於人類有意識的勞動，創造了文化：即使是人類無意識的勞動，它也產生了文化？原始社會的詩歌、藝術，大體是無意識勞動的產物；而高形態社會的一切科學、文學、藝術等等，則大都是有意識勞動的上層建築。

概括說：文化的範疇，它不僅限於文學、科學、藝術等等上層建築？在這些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之外，還包括有生活樣式、習慣、風俗等等。申言之，文化的範疇，它比意識形態更廣泛，意識形態不過是構成文化的一部，而文化則是包括意識形態在它的領域之內，有許多比較更接近於經濟基礎的事物，——即比較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更接近經濟基礎的事物，

都是列於文化範疇內的。故伊里奇說：「構成文化的本質的東西，不盡於科學、文學及藝術、更進一層，還是根源於生活深處，而不從舊籍出來的習慣及觀念，是自然地成就某種東西的能力，以及在一定形式上，行動的習慣的意味上的技術。」

文化是擁有時間性，空間性的。它是規律的被社會經濟結構所決定。集體勞動決定了民族社會的文化，農奴制度決定了封建社會的文化，而自由勞動則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這些民族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皆如其內容與實質：各有其時間性與空間性。它們的產生、發展、變化、消滅。都與經濟結構的變遷相適應。某某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結構建立或滅亡，則與它適應的文化，亦或速或緩隨之產生或消滅。羅馬的古代建築藝術，因了奴隸社會的瓦解而湮沒；而西歐的僧侶文化，則因封建制度的建立而繁榮增長。這些，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所以文化與社會經濟結構是具有統一性，不能分劃的；文化與時間性空間性之間，存在着密切的紐帶，也是不能斲斷的。假使是遊離了社會經濟發展之史的過程，那末文化便成了空虛的抽象概念；又若抹煞了時間性與空間性，那就更不能去理解文化的本質了。

再文化的民族性，也是不能抹煞的。文化之有民族性，亦猶文化之有階級性，兩者具有同樣的意義。雖然，現在資本主義高速度的生產過程，已將整個世界社會經濟聯鎖構成為有機體的連環，逐漸破碎了民族間的壁壘；但民族性的殘餘，却並未因之而蕩然無存的。反之，它依然隨時表現出它的力量，資本主義常常憑藉着「民族」的觀念，來隱藏階級性的對立。這原因，當然是資本主義文化塗染着極其强調的民族主義色調。然而，正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在現階段，仍然有其不可抹煞的位置。關於這，伊里奇更有深切的闡明，他認為即使是在社會主義文化的範疇內，民族性仍是存在的：

「是的，國際文化不是無民族的，我所愛的聯盟者呵；任何人也不會主張那樣的事情，誰也不會要求『純粹的，』不是波蘭人的，也不是猶太人的，也不是俄羅斯人的文化，所以你的空談，只是追逐那想用空論隱祕事體的本質的目的的牽制行動。」

還並不是什麼玄妙不可思議的事情，社會主義文化內包含着資本主義文化的民族性，此亦猶爲資本主義文化內包含着封建制度的僧侶文化一樣。這是因爲文化的形成是有連續性的原故。文化不是一天兩天所能創造出來的東西，也不是學者們的自由意識，或政府的一紙法令所能創造出來的東西；它的形成，僅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所發展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果實。因爲社會經濟之史的發展過程是連續不斷的，所以在其上面所建築的文化，它的形成，也是連續不斷的。資本主義文化，只有一方面接受封建社會的文化遺產，他方面，復發展新的高形態的文化的飛躍，然後方有形成的可能。若沒有封建社會的文化遺產，資本主義的文化，是無由形成的。

文化遺產的接受，其意不是無條件的攝取前歷史階段的全部文化。單純的保存起來，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對於前期文化，予以詳細的分析，與批判的攝取。這是須要一定的標準的。在這標準所決定的範疇內，消極方面，便給予舊文化的渣滓以適當的揚棄，與克服，積極方面便展開高形態的文化的飛躍。這樣，適應於特定的歷史階段發展的文化，乃可建立。至於文化取捨標準的決定，自然，它是被某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所制約而決定的。易言之，標準的決定，是須要把握住文化與社會形態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三　過去的中國文化運動

「人類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但要在既存的並制約他們的環境之中，並且要以眼前存在的事實的諸關係爲基礎，在這些關係裏面，經濟的關係，固然也能爲其他政治的關係及觀念形態的關係所影響，但結局，經濟的關係，卻是決定的關係，並成爲領導到理解之道的一貫的線索。」（恩格斯機械論的唯物論批判）

這話，是異常正確的，經濟的關係，是理解任何社會形態的一貫的線索。我們爲了要正確的把握被經濟關係所決定的文化形態起見，必須先要對經濟關係有一確切的認識。同樣，我們爲要了解過去的中國文化運動，亦必須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有一個清楚瞭然的概念。

中國自一八四二年以還，從前固有的社會經濟形態已根本發生了質的變化，封建經濟的殘餘逐漸趨於滅亡，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則連續不斷的增長。然這種現象的存在，卻不是歐洲十八世紀的初期資本主義在中國搬演了歷史的重複，可以此爲紐帶而進展到資本主義的階段，正是相反，中國之有資本主義生產諸關係的增長，倒是外來的資本主義宰制，壓榨，剝削中國民族的結果。它，——一方面雖然啟發了中國資本主義要素的增長，但在他方面，卻桎梏着中國社會形態的飛躍過程，使之不能由初期資本主義更進而發展到資本主義的社會。所以中國僅能形成現在的「變質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

這種社會裏面，中國的民族工業雖然有相當的發展，但卻因了金融資本主義的宰割，不能絕對的發展。因此，中國的商業資本的作用，不特不能助長民族工業，隸屬於產業資本之下；反之，反積極轉化爲金融資本主義之附庸，與之合流而瓦解整個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它的特殊作用是一面作爲商品輸入，原料輸出的樞紐，與金融資本分些殘餘的額外利潤；一面則作爲金融資本主義浸入農村的連環，且更與本地的高利貸資本合流，瓦解農村經濟。於是，這遂形成社會的兩極端的畸形現象：都市商業資本的極度繁榮，銀行業年年獲得大量盈餘？而在另一極端的農村，則呈現着農民戶口的減少，荒地面積的增加，農產物的衰微凋敝等等空前絕後的狀況。

在這種社會形態裏面，所形成的文化運動，隨着金融資本主義宰割程度的增長，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瓦解程度的深淺，而呈現各種質的差異形態的文化運動。

初，當資本主義又動搖了中國固有的社會經濟結構之後，一般知識分子士大夫之流，深深的感到：中國固有文化，不足以抵抗軍艦大砲所薰陶成的資本主義文化；已經知道本身有或多或少的缺點了。於是，遂發生了曾李的「洋務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這些運動，都是具有一貫的傳統思想：中國所不及的；不過是「物質文明；」「神精文化」則是中國高於西洋，根據了這種形而上學的認識論，「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遂形成當時文化的特徵。「博採西學，」

『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以爲這樣，便可以『國富民强。』這種畸形思想的產生，亦自具有歷史背景，即是資本主義雖然帶來了巨大的摧毀力，但這『力』的摧毀程度比較上還未深刻化，中國固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基礎依然還可在某種程度上，保持其殘餘勢力。

這種情形，是不能長時間賡續維持下去的，資本主義高速度的剝削，中國經濟基礎更進一層的瓦解，到底又揭起了中國文化運動的另一波瀾，即是『五四運動。』這是進到高形態的反封建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當然這次運動較之辛亥以前的運動是徹底多了。它知道，孔孟固有文化已是死去了的僵屍；它知道，中國的封建的精神文化，是不如西洋的資本主義文化；它又知道，『德先生』『賽先生』是歷史的產物，中國應該『迎頭趕上。』但這運動又是不幸，並未產生若何大的效果，雖然它也有一點小的成功。這原因，不外是這樣，幾年的歐洲戰爭，刺激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積極發展，民族工業發展達到某種程度時，接受資本主義文化的條件，遂有相當的成熟，並且也已感到資本主義文化的必需，所以在這種情形下面，『德』『賽』兩先生便成爲時代的驕兒，而從前特權階級文言文字，遂一變而成爲普通的白話文。這正是民族資產階級向前進展的活躍現象。但中國民族工業的繁榮，待到大戰停止，國際的資本主義又再生的時候，這朵繁榮的蓓蕾，不久，就逐漸的凋謝，再也沒有重溫那種春色的夢的可能。於是五四運動，遂不得不宣佈它已成爲歷史的陳跡，沒有再向前發展的可能了，這正表示中國民族工業在國際資本主義的桎梏下，是怎樣的不能抬頭，而中國的資本主義文化，又是怎樣的沒有建立起來的可能性！

再後，國際資本主義對於殖民地的剝削程度，愈益白熱化，中國經濟基礎的瓦解，愈爲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於是反映在文化形態上面，便產生了五卅以來的反帝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這種運動，雖然有它發揚滋長的泥土，但爲了（一）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是必須建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之上；（２）國際的資本主義高壓力的堅固强大，因之這也不能有若何充分的發展，所表現的，也不過是疲弱的現象！

這些，便是中國過去文化運動的鳥瞰。

現在，中國社會更進展到整個滅亡的前宵。這裏，最後一次的再出現了這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運動。這是最後的文化運動，再沒有「最最後」的可能了！這是如何具有嚴重意義的一個關鍵？在這關頭，我們應該怎樣的「把握現實」來建設「現在中國」的切要而必需的文化！

然而不幸！這裏竟有許多玄學的形而上學的種種空想的出現。

四　基督教文化

中國是「變質的初期資本主義」的中國。在這種變質的社會，必然呈現許多畸形的思想，這是無可避免的。但這種一團糟的自然現象，雖然是「自生」的；然在建設一種典型底文化運動的時候，自當對於現實的各種思想，給予正確的積極的批判。有的，適宜於這種文化運動的，便應當將其內容豐富起來，予以積極的展開；有的，不適宜於所需要建設的文化，便應當予以絕對的無情的克服；再有的，雖不是積極的適宜，但在某種程度上，却有利於所需要建設的文化，這種事物，亦應當給予單純的保存。這卽是伊里奇所謂：當建設某種文化的時候，應當正確分析「重要的東西與不重要的東西」以及那些不必要的東西。

現在根據客觀現實的中國社會，對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的一切不適宜的思維，不必要的思維，個別的予以積極的廓清。

先，我們須要廓清的，是「基督教本位」文化，卽是說：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範疇內，是不是需要基督教文化？我們的答覆，則是簡單的否定。

劉湛恩先生說：「……以爲基督教不能稱爲中國文化，但是基督教並不是西洋的，基督教是世界的。基督教有基督教的眞理，基督教並沒有國界。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決不是能夠單獨造成的，好像演奏音樂，要是只有一個鋼琴，老是在

册册的彈，多麼單調沒有意思，所以一定要與別種樂器聯合起來，纔有意義。世界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也應該互相融合纔是辦法。」（文化建設座談會上語）這些話，簡直是傳道牧師的囈語錄。中國文化需要與基督教文化「互相融合」那末，這種文化，單純的是劉湛恩劉廷芳之類所需要的文化，絕不是整個中國國民所需要的文化。

揭穿了說：宗教是什麼？不過是人類對於自然不認識，不了解，從而生產的「野蠻的觀念意識形態。」上帝是什麼，不過是「人的神格化」了的概念。教會是什麼？不過是「人的裝置」了的社會組織。一切宗教的神秘性，都是爲此；當然基督教亦不能例外。

古代的基督教，它是流氓無產階級反抗現實運動所產生的一種宗教。考茨基，在基督教之基礎內，曾經說過：「基督教在出現之初，不用懷疑，原是最複雜的貧乏階級的一種運動，我們可以把這些階級總稱爲無產者。」耶穌在當時，不特是反抗猶太統治階級的壓迫，抑且反抗羅馬帝國統治者的殘酷榨取，故基督教的原始性，是充份具有原始共產主義的性質。這種性質，其後因資產階級的侵入，遂發生了「質」的變化。待至中世紀封建制度時代，基督教已完全變化到另一極端，純粹作爲封建統治層榨取民衆的御用工具。它的任務，這時已是擁護統治者的特殊權利，及調解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間的矛盾。再在同時，僧侶階級在封建社會裏，簡直是社會經驗的保存者；知識的獨占者？

「他們貯蓄一切知識於自己的頭腦中，以上述傳遺於下一代的僧侶。不久，發達了文字；這文字完全爲僧侶所獨佔，在古代，一部份在中世紀，他們是唯一有學識的人，那些能通古代東方各國社會生活的象形文字，都是僧侶所作成的，中世紀歐洲的封建社會，也是這一種狀態。那時，讀書的能力，是僧侶的特徵。」（波格達諾夫經濟科學大綱）

那時的科學家，立法家、醫生、教師等等，幾乎大都是非僧侶莫屬，這才真是所謂「基督教文化！」

然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不免給予「基督教文化」以一個決定的否定，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便是粉碎它的鐵棘的巨錘！由是而後，資本主義的到來，基督教又變化到另一形態；此時，基督教已不以粗野的唯神論爲其基礎，拙劣

的『奇蹟觀念』為其理論中心；而是以高形態的唯心論為立脚點了。關於這，布哈林曾有正確的論說：

『但是招致經濟交換而破壞了封建政治的經濟發達，不僅從神們奪去了鶖鷺的羽毛，而且取消了他們從前所有的鬚髯及其感性。現在萬物所依存的教神的布爾喬亞，祇將神們當作外形上與人類全無共通之點的，或者不能知道，不能認識的存在，而加以信仰，這是神性的靈，而不是野蠻的人粗笨的神。這樣，我們在經濟上，一方面，可以看見支配的隷屬關係，他方可以發見一種以交換為媒介的無組織的結合關係。第一的狀態，可以說明宗教為什麼保存的原因；第二的狀態，可以說明神們為什麼變成這樣細瘦而沒有筋骨的理由。』（史的唯物論）

這是基督教產生、發展、變化的一個簡約敍述。

資本主義進展到現階級的金融資本主義的時候，它的商品流通，已將世界經濟結成有機體的連環，而基督教復又在這種情形，展開它的活動範圍，深入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階層中，它的作用，在此時，已完全成為金融資本主義的隷屬物；純粹的作為有利於經濟搾取的麻醉精神工具。這樣，理智的桎梏與勞動的剝削交相合流，遂使一般殖民地的民衆，瑚如羔羊的永遠鎖繫於帝國主義之鐵蹄之下！

又，它為金融資本主義的服務，不僅在殖民地已經被金融資本主義作為所宰割的場合；而且，它常勇猛忠誠的去作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

『帝國主義國家為奪取殖民地，及經濟的征服半殖民地，都以輸出資本為第一手段，但是勝過這種手段而擔負了這種先驅的使命的，却是牧師與宗教家。他們以傳教的名義，走進本國資本勢力正要進攻的未開化國及半殖民地，或者講釋教義，或者——最多數的場合，這是最初的着手，也是最有力的方法——施與物品，創辦教育文化的設備。（這是用他們本國的財力的！）應用這些手段他們率先的完成了『開闢草莽』的任務，這種準備行動，不僅可以使本國帝國主義勢力勢如破竹的進攻；同時可以和解未開化國家及半殖民地民衆（即被榨取階級）對於自己搾取國家之間的對

立，而擁護這種搾取的關係。所以宗教的形態和規模，雖有變化，但是從他遂行的任務上看來，現在和從前，是一點分別都沒有的。」（靑野季吉觀念形態論）

這種情形，只要稍翻一翻劉彥著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即可知道基督教在近代的中國是起了如何重大的作用：中國之有而今這種地步，不得不說是基督教充任「先鋒」的成功！任何人只要稍據歷史常識，這種史實是不能抹煞的，不能否認的！

是的！不錯！基督教文化是具有世界性，中國文化也有基督教文化之一部。然而基督教文化之具世界性，正是金融資本主義將世界經濟連鎖成一片的表現；而中國文化之所以含有基督教文化之一部，正是資本主義的商品流通到窮鄉僻野的反映。至于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價值」，則不過掩護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剝削關係，如此而已！

故基督教在殖民地化的中國，它完全是麻醉中國民衆，奴化中國民衆的一種毒素，在「上帝愛我，」「世界和平」的祈禱聲浪中，簡直掩藏了帝國主義吸取中國民衆骨髓的猙獰的面目；而在「主啊！阿門！」的虔誠永拜中，簡直是麻醉了中國民衆凍餓饑寒的反抗情緒！所以對於這種文化，在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過程中，必需予以積極的克服。不然，若聽其自然，讓基督教文化的毒素，滲浸于中國本位文化領域之內；那末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即難免不一變而爲「中國本位奴隸文化」的創造！

基督教文化是奴隸文化！

五　啟蒙主義文化

在中國本位文化運動的建設過程中，有的又提出了「民族性格」的因素。中國本位文化，據說應當建築在「中國本位民族性格」的上面。不然，若是抹煞了「民族性格，」則文化建設，「卽使有些微成就，」它也不是「中國本位的。」這種主張，以潘光旦先生爲其代表。他認民族性格是：「我們認爲是更根本的因素。」關於他的具體的意見，下面便是一

段簡短的摘錄：

「至於本位的第三個因素——民族性格，歷來談的人自然是更少。在這方面不斷的作一些寒蟬之鳴的，恐怕祇有本刊了。但民族性格這樣東西無論我們把它當作一種後天的習慣看，或先天的遺傳性看，終究是很實在的。並且它的個別性的顯著，也不在地理與歷史兩個因素之下。依我們的意見，我們並且相信這種民族性不能全沒有先天的根據。這種根據一部分可以推源到民族所由組合而成的各個種族的原先有的特質；一部分乃是歷史期內自然淘汰與文化選擇的產果。這一方面的話我們以前已經說過不少，現在不贅。沈有乾先生在最近期的教育雜誌裏，發表了一篇中國民族性的一斑，報告他試用美國朋路透氏品性測驗法的結果。他所得的結論也許一時還不能認為定論，但也不能說與事實完全不切，只要與事實有五六成以上的符合，那就不容我們不注意。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無論是為好為壞，我們總不能不明白承認民族性格是本位中的一大因素。」（華年周刊，四卷三期。）

這些話，一半是形而上的優生學，一半則是唯心主義的觀念論。關於優生學的部門，記得前幾年孫本文先生曾對於這種皮相的說法，給予了一個嚴重的襲擊，今姑不論。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是『民族性格』在文化範疇中，究竟是不是一個『根本的因素？』

認為民族性格是『根本的因素』的，此外亦大有人在。譬如：劉振東先生在文化建設一卷六期裏，也曾具體地指出來，以為欲建設文化，則民族性格必須『根本加以改造』（雖然他意識着，還是『心理建設，』然而，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改造的方案則是『一曰同情心之必須培養也；二曰守法奉公心之必須樹立也；三曰依賴心之必須剷除也；四曰卑妄性之必須痛改也；五曰創造心之必須發展也；六曰門戶之見必須破除也。』如此這般的列舉以後，劉先生乃以其悲天憫人的十足道學氣味，而長太息曰『嗟乎，吾同胞之缺憾亦多矣，此特其顯著者耳。』劉先生真不愧是道地的長者。

這些觀念論的說法，它的價值，只有作為風雅閒談的資料，若說在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是一個『根本的因素』的話。

那末我們要堅決的否認的。

這種『民族性格』的論調，我們試一檢討過去的歷史，立卽看到：它完全是因襲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代的『人性』學說而來的，這雖然也有歷史的價值；但畢竟是過去文化的花果。在現在，面對着撿拾它的一些殘滓，來建設中國文化，此不會是古代僵屍思想的復活，復古運動的幻夢！

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者的主張是這樣的：人的觀念形態是『感覺的變形物』，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被社會關係所規定的。但人類觀念既為環境所決定；那末環境呢？關於這些答覆，却又是人類社會關係的環境，是被人類觀念所支配。『世界是為意見所支配的』這種矛盾說法，正是康德的『二律相背』的表現。

啟蒙主義者既認『人性』是社會『根本的因素』，於是當然的邏輯結論，卽是人性是說明一切社會關係的鎖鑰：『十八世紀的著述家關於人性不必抱同樣的觀念，關於這點，他們還有極為相異的意見，但他們都一樣地相信，對於這種人性要有正確的見解，然後纔能把握着說明社會現象的秘鑰』（樸列哈諾夫史的一元論）故『人性』之在那時，完全是萬能的。無論是批判，分析任何社會現象，都以人性為其中心的立脚點。

所以，當那時，人們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衰微振興，都是以國民性格去加判斷。假使國民性格是有教化的，有道德的，有理智的，那末這個國家必强，它的政治制度必健全，反之，若國民性格是無道德的，無教育的，無理智的，那末，這個國家必弱，它的政治組織亦必頹廢。而且國民性格不僅是作為判斷國家政治制度的因素，簡直就是決定國家政治制度的『根本的因素』。國民性格變了，政治制度亦隨之而變。據說：羅馬末期，國民性格驕奢淫佚，卑賤怠惰，因此，遂完全將整個的帝國摧毀了。

然而這種以『人性』為社會『根本的因素』的形而上學，不久卽發生根本動搖。人們對于社會關係的發展，已深切的感到『人性』說之不切合於現實，尤其是法蘭西革命的進行，它的巨流已將『世界為意見所支配的』思想，打個

之說，於是人們不得不去尋求另一種思維，來理解社會關係，來把握社會本質，至此，基佐、齊埃爾、密尼埃等等的學說乃應運而生。他們去棄了啟蒙主義者的『人性』而以『財產關係』來把握社會關係發展的過程。雖然他們還是不能了解『財產關係』是為何種因素所決定，但以『財產關係』去理解社會，這在思維發展的途程中畢竟是一個新的高形態的思想，已逐漸接近對於社會關係本質的認識了。

不料，這種已經死去了的啟蒙主義文化，過了兩世紀，還在中國有他的信徒。

潘光旦在『談中國本位』一文裏，他的思維樣式，正與十八世紀啟蒙主義者一般無二。例如他說中國文化有三種因素：『一是我們個別的地理與物質環境；二是我們個別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組織；三是我們的也是比較個別的民族性格。』而其中尤以『民族性格』為根本的因素。這，恰如啟蒙主義所說？人類的意見為環境所規定，環境又為意見所規定：而意見復是支配一切的基本因素。

這種『二律相背』的邏輯，應用在文化建設運動中，必然，又成了這樣方式：由中國民族性格之萎靡頹唐，於是造成國家的衰微；但欲改革這些不良的民族性格，勢非求諸國家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可。因為照啟蒙主義者的說法，國民性格固是支配國家制度，而國家制度復是制約國民性格的。苟其如此，那末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大前提，遂成為中國國家政治制度的必須改革，民族性格的必須改良；若現在的政治制度沒有改善的可能，則民族性格亦即沒有改革之可言。民族性格沒有改革，則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結果等於不談。』這是潘先生的邏輯的當然結論，如此，文化建設只好不談了，不建設了。因為政治制度未改良，民族性格未改革，在此之先，而言文化建設，豈不是空虛的妄想嗎？

又，中國民族性格究竟是怎樣的呢？照潘光旦的意見，他是極度同意于沈有乾先生在中國民族性的一瞥一文裏的論斷的。雖然，『他所得的結論也許一時還不能認為定論，但也不能說與事實完全不切，只要與事實有五六成以上的符合，那就不容我們不注意。』現在，我們來『注意』一下：能夠一翻新年號的教育雜誌，我們看到沈有乾先生以朋路透氏

品性測驗法，測驗中國民族性格的結果。這結果是列舉了七十種性格，而這七十種性格，大都不外是卑賤、怠惰、虛浮、畏縮。這正是魯迅的阿Q的情形，也是沒有人去否認的事實。

我們並不要否認這些中國民族性格的缺點，我們現在所要追問的是：這些卑賤、怠惰、虛浮、畏縮的性格，是怎樣造成的？是不是中國社會衰弱的『根本的因素』，而且反是為了中國社會衰弱的環境才造成這些不良的民族性格，這些性格就是中國變質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映。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窮兇極惡的無人道的榨取，以致造成了這種空前未有的無秩序的極度混亂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下所生息的民族，必然的，除了形成卑污、懦弱、奴化等之性格而外，其他健全的性格自無由形成。這是彰彰然的事實。所以中國民族性格，正是中國現實社會的『果』，而並不是中國現實社會的『因』，且更談不到是甚麼『根本的因素』。質是之故，在文化建設運動過程中，提出改革民族性格的主張，不啻是虛無縹渺的空想！因為若是造成這些民族性格的社會環境不改變，則民族性格的改革，即無從改革；又若是依存於現實社會環境，而企圖改革民族性格，則在奴化底社會下所改革的民族性格，依然還是奴化底性格，頂多也不過是將『低等華人』改革到『高等華人』而已。奴性的質，是絕對的不能改變的。

啟蒙主義文化是復古的空想的文化！

六　資本主義文化

廿世紀是資本主義飛黃騰達的王國，今日之中國，是廿世紀的中國，是以中國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必要。這種主張的提出，首推李麥麥先生。

李先生在『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文裏，（文化建設一卷五期）具體的提出了他的意見。意見的大要是：首先他抨擊宣言的『二律相背』性，即一方面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一方面又要『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作徹底的改造』，而固有的一些中國文化『特徵』，大都是不應當作為所需要的『特徵』而

保存的，這樣，舊的文化既不足取，則新的文化就應該創造。於是李先生的結論，即是：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文化！

是的資本主義文化是現代支配世界的文化。中國既是現代的中國，當然需要建設現代的文化。這話，在邏輯上固亦是當然的結論；但苟把握住現實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這些話，却不啻一變而成為形式邏輯的錯誤論斷！

現在，我們先來檢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是否據有『二律相背』性？因而，為了避免這『二律相背』性起見，我們必須要徹底的使中國文化建設運動完全歐化和近代化？

宣言從頭至尾是沒有表現着『二律相背』也未嘗有過以『二律相背』為『宣言的基本精神。』試看『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不盲從，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它的意思正是意味着根據此時此地的中國需要，來批判固有文化，攝取現代文化。這正是辯證法認識論的展開，何來有『二律相背？』中國是世界的一環，所以應該而且必須攝取現代文化，中國自有其特殊性，所以對于固有文化亦應該予以批判的保存和揚棄。這絕對沒有意味着：批判的保存固有文化，即是障礙了分析的攝取現代文化。因而，苟欲積極的攝取現代文化，便應當無條件的揚棄固有文化。這種理解，不外是死板的機械論的說法。任何文化運動，都沒有這樣的單純？一味的接受新的，完全的放棄舊的。李先生忘了，文化是有連續性的。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下建設的國際文化，亦並未排除各別的民族性於不顧，何況中國在現階段的文化運動，怎能完全捨去固有文化呢？這不是閹割史實的空想而何？

仔細分析李先生『二律相背』的論斷，知道他是誤會了宣言的意思。宣言是：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而李先生則以為是根據它所要揚棄的固有『特徵，』而來建設它所企圖創造的中國『特徵，』而來建設它所需要的中國『特徵。』這樣南轅北轍的結果，遂產生了

李先生『二律相背』的認識論。至於宣言的目的：『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這是否具有可能性？及現實性？那又是另外一個渺茫的問題了。

然而資本主義文化，中國是否需要？若是需要有無建設的可能？關於這，我們直接的答覆是：問題不在中國是否須資本主義文化；而是在中國是否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

李先生對於日本文化的估量是對的：『日本之所以有今日之日本，是在日本人能如畫家之所言；保存日本文化，抑在日本能徹底模仿西洋文化呢？我敢說，是在日本能夠徹底的模仿西洋文化。』然而李先生却忽略了：日本所以能徹底模仿西洋文化，是以其有能徹底模仿的社會條件存在。日本有這個社會條件，而中國則未必有這種社會條件。抹煞了社會條件而不談，僅去注意外表的形式；認為日本能這樣，中國也能這樣。這簡直是李先生的形式邏輯在作祟。

日本在十九世紀的時代，因為當時西歐資本主義成熟還不久，故力量還薄弱，其侵入日本封建社會，不得未能完全宰制日本，使成為殖民地；而且反刺激日本的新興生產方法的發展。日本民族工業積極的飛躍，很迅速的排斥了外來資本主義勢力，日本社會遂從而進展到高形態的階段——資本主義社會。這樣，日本社會經濟結構的資本主義化，當然是建築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面的文化，亦是很快的資本主義化。所以能夠徹底的模仿西洋文化，這完全是因為有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存在。有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很要資本主義文化，所以它去『模仿；』又有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完成，所以它方有『徹底的』模仿的可能，使西洋文化繁榮滋長，融會貫通，一變而成日本文化。這種日本文化的歷史的成果，是不容抹煞的！

中國呢？中國是否也具有這種社會條件？！不絕對的不！中國是沒有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

中國，正如我們所認識的，是變質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在這社會裏面，只有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增長。至於中國的資本主義關係，雖然在其所刺激下呈現着相對的發展；但這發展，却復為金融資本主義所桎梏，不能更進而得

到絕對的發展，這即是說：中國民族工業不能絕對發展，則中國即不能有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這是鐵一般的現實。中國既然不能進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國自亦不能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這又是不可動搖的邏輯結論。

由此可知日本是具有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所以它能徹底的模仿西洋文化，而收穫絕大的成功；而中國則因不能具有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所以不能同樣徹底模仿西洋文化，而與日本收同樣的效果。故李先生的論說：『又假如說處在農業和工業『交遞』時期的中國非完全蛻化為工業社會不可，那麼，中國文化運動之歐化和近代化目的是應明白提出的，而中國文化運動之反東方化任務亦應同時提出』這些話，可以不攻自破了。

且中國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並不是沒有實行過，並不是在今日中國方始有攝取資本主義文化的需要，早在過去的五四運動已經是吶喊出『德』先生，『賽』先生的名詞了。然而結果怎樣呢？雖然收了或種程度的效果，但因為歐戰停息，國際的資本主義捲土重來，方興的民族工業復遭摧折。五四運動不過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五四的文化運動，其不能積極展開它的姿態，正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教訓。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因而它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是必然的失敗的。這種歷史經驗李先生未嘗不知道，他也曉得：『中國在最近三十年來一切社會運動，都只是重複歷史經驗』既然了然過去的錯誤，何以現在又復提出『資本主義文化』的口號，來重複五四運動的歷史經驗呢？這豈不是突梯滑稽！

所以說，資本主義文化是死板空想的文化。

七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文化

在上面，我們對於基督教文化，啟蒙主義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等等，已經各別的給予積極的批判與指摘。現在，正面的，我們要提出現階段的中國文化運動，是應該建設何種形式的文化？

文化的建設，是必須與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這即是說在建設文化運動的過程中必須要把握住文化與社會經濟結構的統一性。這是主要的條件。其次，文化的時間性、空間性、連續性、民族性，這些次要的條件，亦不能忽略，必須予

以嚴密的注意。這樣，在主要條件，次要條件互相綜合之下，便可律定一個適當的文化建設的標準。標準律定了，然後在這標準所決定的範疇內，便可對於舊的文化與新的文化給予以個別的分析，批判與攝取：何者應當積極的克服，何者應當單純的保存，何者又應當絕對的發展。於是文化建設運動，方可收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之效果。

據此，我們試來談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應當建設怎樣的文化？

『中國本位文化』，它的正確的理解應該是：適宜於現中國的需要；及利於其發展的文化。若然，則中國現階段的社會，是『變質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這社會是不能進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它只有飛躍到另一高形態社會的可能。在這種社會形式之下，必然的，它的文化運動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在高形態社會的飛躍到來之前，作積極的準備。此外，次要的任務——便是：在消極方面，應當對於障礙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切前資本主義因素，給予以絕對的克服與揚棄。這即是說：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應該在實行這種雙重任務的標準之下，作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啟蒙運動而出現。

這樣，在這種標準所決定的範圍內，目前，它的必然任務，是賡續五卅以來的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且還必須要在更高形態上，將這運動的內容豐富起來，加强起來，這就是說！凡是在現社會上所畸形的一切奴隸文化、復古文化、空想文化、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都必須予以無情的攻擊與剷除，廓清了黑暗的一角，然後始能開光明的一面。

這樣的文化建設運動，方始可以稱為：適宜於此時此地需要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

『可是，上述任務的實現與完成，是具有壯烈的鬬爭的革命意義。因之，未來的真實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又是具有革命的鬬爭的與創造的要素，而不是單純的模仿與翻譯，同時也不是妥協與奴化，再不是安命與樂天，更不是頹唐與幽默等傾向。這些傾向，皆不是中國文化當前的要求，而必須徹底清算和否定。中國本位的文化運動之基本任務，卽在於此。』

樣洪生先生這段說素是正確的。

總之，這是中國文化運動發展的正常途徑，至於能否這樣，當然，那又是另外一問題。不過，若是遊離了這現實的必然

動向，而在其他方面發展；那末現在的文化運動，難免不是知識分子幻想的破滅！

（文化建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